

跨世纪的中国社会史研究

常建华

(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天津 300071)

摘要: 本文回顾了1996年至2006年十年间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状况。认为社会史理论的探讨具有开放性与多元化, 具体分析了学者界定社会史看法的改变, 新的观点认为, 社会史的学科体系是多元化的, 社会史研究不能过分依赖社会学, 社会史是研究对象与研究视角的统一。还分析了“跨区域研究”、“重提政治史”与社会史区域研究以及社会史整体性的关系, 指出应当对区域社会史研究的有效性有充分的认识与自信, 同时也应当对区域社会史研究的限度进行深刻的反思与自觉。还指出社会史史料学讨论的重要性。认为中国社会史研究具有探索精神, 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特别表现在社会史的综合研究、婚姻家庭、家族宗族、社会分类与结构、民间信仰、社会风尚、城市、乡村与社区、生态环境、救灾与慈善事业、人口问题等方面。还认为社会史研究赢得了机遇并面临挑战, 社会史研究的特点是研究者能够从多元视野看问题, 加强社会史与各人文社会科学的对话。近年来人类学影响社会史最大, 甚至可以说社会史发生了人类学的转向。融合疾病、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医疗社会史研究起点很高, 思想史与社会史的结合出现了一些很有影响的著作, 地理学与社会史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社会史研究多采取地域社会史的研究视角, 认为地域是认识中国历史的有效途径, 各区域社会史的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社会史与文化史的融合已成趋势。展望未来, 作者指出更新观念与跨学科的研究视野仍是应努力的目标, 社会史应保持自己学术研究的人文关怀, 社会史对于书写大历史应有独特的贡献。

关键词: 社会史理论; 多元视野; 区域研究; 日常生活; 社会文化史

中图分类号: K2 **文献标识码:** A

我曾著文总结改革开放以后1986-1996年十年间复兴的中国社会史研究^①, 时光荏苒, 自1996年至今, 又过了十年, 我们经历了世纪的更迭, 而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学术水准也迅速提升, 以新面貌进入新世纪。我们有必要分析这十年来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理论思考, 总结其学术成果, 并展望未来的趋势。因此, 笔者续作本文, 以反映改革开放以来新时期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全貌。

一、社会史理论: 开放性与多元化

一般来说, 学术的开放性应当表现在具有多元学科视野, 不画地为牢, 同时容纳不同的学术见解并进行理论争鸣, 近十年中国社会史理论的探讨就具有这样的特点。

我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新时期中国社会史研究头十年时指出, 学者对于社会史的界定存在着三个分歧, 即社会史是历史学的专门史抑或通史; 社会史究竟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还是一种新的视角; 社会史学科体系建设及与社会学的关系问题。此后, 得到了一些同行的回应, 并引起讨论, 其中最具建设性的是赵世瑜教授。他从关于社会史概念的一些疑问出发, 辨析各类说法, 并进一步将社会史表述为史学研究的一种新范式。然后分作为历史研究范式

^① 常建华《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特征》, 收入常建华《社会生活的历史学——中国社会史研究新探》,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该文曾以《中国社会史研究十年》为题, 刊登在《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

的社会史，作为整体的社会史，属于历史学而非社会学的社会史三方面论述什么是社会史。他强调说：“我们首先应该把社会史理解为一种新的史学范式，而不是一开始就将其理解为一个学科分支，这才使我们的社会史研究具有新的面貌，避免‘新瓶装旧酒’和研究庸俗化，同时发挥它在改造整个史学方面的积极作用。这样的理解并非已经过多，而是远远不够，因此需要大声疾呼。其次，社会史作为一种整体研究，是作为新史学范式的具体表现。它既不应被误解为‘通史’或‘社会发展史’，也不是可望不可及的幻想，而是我们努力追求的目标。第三，把社会史视为历史学与社会学的联姻，是尤需警惕的倾向。如果仅把社会史汲取养料的兄弟学科限于社会学，社会史不仅会有概念误用，即历史学的社会学化的危险，而且把自己的边界限制的太狭隘了。”^①赵世瑜的论文发表后，又引起进一步的讨论。特别是杨念群教授质疑热门领域区域史，重提“政治史”研究，挑战时下中国社会史研究的主流，具有相当的刺激性，以致赵世瑜发出社会史研究向何处去的提问。这其中的争论焦点，我们在下面讨论。

近年来我又对新时期中国社会史理论探讨的历程与近年来的“社会史新说”等问题有所介绍，认为“就改革开放以来二十多年中国社会史理论探讨的演进来看，对于社会史的学术定位有一个从比较考虑研究对象到兼顾研究视角再到“问题”的过程，始终同反省历史学有关，最近尤为明显。”^②以该文为基础，这里想进一步加以补充完善。社会史学界对于前述界定社会史存在的三个分歧，逐渐缩小，趋于消解。社会史学科体系建设及与社会学的关系问题上，很少再有人坚持社会史就是社会学理论的运用了，近来的新趋势是社会史与人类学的结合，历史人类学成为最活跃的学术领域，2001年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的成立以及《历史人类学》的创刊，给社会史带来了新活力。此外在重视地域社会史的今天，地理学对于历史学的影响也是深刻的，王振忠教授倡导历史社会地理学^③，认为历史社会地理是研究历史时期各地人群的形成、分布及其变迁，研究地理因素对社会文化现象的影响，具体研究内容应包括历史时期社区及社会现象的地理研究，后者包括人群研究、风俗地理和社会变迁等。我们看到复旦大学等高校从事历史地理学的一些学者似乎发生了社会史的转向，他们的研究颇具特色。至于经济学、文化学对于社会史的影响，由于社会经济史、社会文化史的存在，社会史与经济史、文化史交叉渗透早已是不争的事实。社会史的学科体系建设，进入了多元化的时期。

至于社会史究竟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还是一种新的视角，因研究过程中对象与方法从来没有绝对的分离，越来越多的学者在研究中将视角与对象适当兼顾，有机结合，当然这绝不是低估研究视角的选择对于社会史研究的创新意义。冯尔康先生就说：“讨论同一事物，可有不同的关注内容，不同的研究角度，用这个角度去观察那个内容，就可以抽象为一种研究方法；角度可以是多样的、变化的，从某种角度审视问题，把它当做方法来用，它就是方法了。”^④自然社会史也是一种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行龙教授认为“专史说”与“范式说”并不互相矛盾，更没有高下之分。从具有具体研究对象和内容的学科意义上来讲，社会史可以说是一种专门史。另一方面，从史学研究的方法和视角来讲，社会史以其鲜明的总体史追求、自下而上的视角与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为陈旧的史学研究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它又是一种新的“范式”，两者都是社会史蕴含的本质内容。并引用年鉴学派大师布洛克的话：“一门学科并不完全通过它的对象来被定义，它所具有的限制也完全可以以它方法的特

^① 赵世瑜《再论社会史的概念问题》，《历史研究》1999年第2期。

^② 常建华《新时期中国社会史理论争鸣及其演进》，收入常建华《社会生活的历史学》第115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该文的压缩稿发表于《河北学刊》2004年第1、3两期。

^③ 王振忠《社会史研究与历史社会地理》，《复旦学报》1997年版第1期；吴宏岐、王洪瑞《历史社会地理学的若干理论问题》，《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第33卷第3期，2004年5月；王振忠《历史社会地理刍议》，《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5年第4期。

^④ 冯尔康《社会史研究的探索精神与开放的研究领域》，周积明、宋德金主编《中国社会史论》第90-91页，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殊性质来被确定。”^①

关于社会史是历史学的专门史抑或通史，其实是见仁见智的问题，因为本来社会史的概念就有广义、狭义之分，人们可以各取所需。但是部分是由于对社会史的界定不同，在对社会史整体性的理解上存在着较大差异。冯尔康先生指出：“立足于专史，面向整体史，这是我们界定社会史的基本思路。”^②既不排斥社会史研究的整体观念，又把整体史作为广义的社会史理解，提倡作为专史的社会史研究。陈亚平认为，社会史整体研究的方法应和“社会”的整体联系性相统一，只有看到隐藏在社会、社会生活表象下面的多重结构和相互联系，社会史才能实现对社会历史的深层次把握，从传统的“事件——叙事”史学模式发展到“问题史学”的新史学模式^③。事实上“隐藏在社会、社会生活表象下面的多重结构和相互联系”，一般只是在地域社会才能把握，人类学最擅长研究这种社会现象背后的历史。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相信，社会史的整体性在地域史中才有较好的把握，个案研究的微观史学可以有效地探讨事物整体。

但是，问题并不如此简单，个案与微观史学研究者坚持“一滴水也能反映太阳的光辉”，而在批评个案与微观史学研究的学者看来，“一滴水未必就能反映太阳的光辉”。目前有些学者也认为国内的社会史研究出现零碎、细小的弊病，强调通过整体性来纠正。我想对此应该辩证地来看：我们由于长期受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熏陶，比较擅长从宏观和整体看问题，这是我们近半个世纪以来新史学传统的优势。然而宏大叙事下出现的空疏、老套的弊病也显而易见。新时期社会史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要纠正大而无当的套路史学。批评社会史碎化的学者，从保持历史研究整体性着眼，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个案与微观史学研究强调的是以小见大，题目虽小，意义或大，况且个案与微观积累多了，才能有体系化的宏观分析。尽管总体大于部分之和，我们决不能低估个案与微观史学研究的价值。问题在于，提高个案与微观史学研究水平，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政治学者萧延中对社会史研究提出自己的看法：“基本问题”不等于“宏大叙事”，个案深描不等于田野调查，社会史学不等于乡野杂谈。他认为所谓“基本问题”是指某一学科或某一专题研究中不可省略的基础假设，做微观研究时不自觉地忽略了对“基本问题”的设问。田野调查应该是为了“深描”，原则上“深描”意味着“他者”、与“自我”“比较”过程的完成，是两种不同认知结构之间冲突与互动的结果，“深描他者”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就是“重估自我”。最后他提出忠告：如日中天的社会史学研究是否也需要有意识地规避某些可能增长的潜在风险呢？^④他的观点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

接近上述“基本问题”的是杨念群教授提倡的“中层理论”，并揭起“新社会史”的旗帜。中层理论由美国学者默顿提出，指的是社会学中原则上被应用于指导经验性调查，同时也是描述社会行为组织与变化和非总体性细节描述之间的中介物。杨念群认为“中层理论”的建构对于中国史研究的意义：一是尽量可使我们摆脱宏大叙事的纠缠；二是讨论如何改变史界只拉车不看路式工匠型治史方式。杨念群指出：“新型社会史不存在一个范式转换的要求，但也不是一个简单的类分范围的概念，而应是本土语境相契合的‘中层理论’的建构范畴……划定范围当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厘定与传统研究方法不同的规范性概念和解释思路。这些界限的划定不一定具有范式突破的意义。却一定代表着不与以往框架重复的实际操作含义，否则大量史料的发现与阐释有可能不过是为解读旧有框架服务的工具而已。”其次，新社会史“就是要在由传统经济史出发而建构的整体论式的架构笼罩之外，寻求以更微观的单位深描诠释基层社会文化的可能性。”^⑤“新社会史”的另一位合作者旅居日本的孙

^① 行龙《也谈社会史的“专史说”与“范式说”》，《光明日报》2001年7月3日。

^② 冯尔康《社会史研究的探索精神与开放的研究领域》，周积明、宋德金主编《中国社会史论》第91-92页。

^③ 陈亚平《社会史研究整体性刍论》，《天津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

^④ 萧延中《社会史研究中三个可能被“误读”的等号》，《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⑤ 杨念群《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第202-203页，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江教授干脆直截了当地提出抛弃众人皆言的社会史研究的整体史追求，他认为，新社会史可以作出的第一个选择是放弃建构整体史野心，因为历史学家不可能建构整体史，建构整体史的努力窒息了历史学的发展。主张接受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关于解读文本的观念和方法，并摆脱以美国中国学为中心的中国研究^①。

“新社会史”合作者的近期工作，展示了他们的学术追求。杨念群主编《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计有导论《东西方思想交汇下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一个“问题史”的追溯》外，共分三编：空间：传统到现代的建构，知识传承：东方与西方，历史记忆与中国基层社会。收录了王铭铭、杨念群、应星、秦晖、景军、程美宝、梁治平、赵世瑜、方慧容等九位来自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和法学等不同学科的中青年学者的十篇论文。这些研究基本都从个案入手，对明清以来中国社会的空间观念、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地域文化以及社会转型等问题做了全新的探索。“新社会史”学者创办了自己的刊物“新社会史”，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分别于 2004 年、2005 年推出。孙江主编《事件·记忆·叙述》是第 1 辑，全书分为两部分：政治·事件的阅读方法部分与记忆·象征·认同部分。编者“阅读沉默：后现代主义、新史学与中国语境”一文，作为代序言。黄东兰主编《身体·心性·权力》为第 2 辑，分为三部分：心性·记忆·表象部分，收录孙江〈太阳的记忆〉、潘光哲〈“华盛顿神话”在晚清的创造与传衍〉、黄东兰〈领土·疆域·国耻〉、王晓葵〈革命记忆与近代公共空间〉、李恭忠〈中山陵：政治精神的表达与实践〉5 篇论文；身体话语与权力部分，收录海青：论自杀、张哲嘉：为龙体把脉、苏成捷：作为生存策略的清代一妻多夫现象、阿部安成：预防传染病话语 4 篇论文；认识论的回转与新社会史部分，收录杨念群〈医疗史、“地方性”与空间政治想像〉、岸本美绪〈场、常识与秩序〉2 篇论文。除了这 11 篇论文外，黄东兰、孙江所写的“引言：知识社会史的视线”特别提出了他们的“新社会史”主张：“史家必须思考历史记录和叙述行为所依托的知识和思想背景，历史是怎样被表象化的，这种表象化多大程度上记录或抹杀了历史等问题。”（第 11 页）试图克服 20 世纪 80 年代社会史研究“对历史细分化的努力”的局限性。上述三本论文集充分体现了学科交叉的特点和由此带来的新理念、新方法尝试和创新，在问题意识、研究方法、叙事方式、资料利用等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突破，从一个侧面反映和展示了 199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史的新取向。然而，我们也强烈感受到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以及后现代主义对他们的深刻影响，因此我们在肯定他们求新精神的同时，也认为警惕后现代史学存在的解构整体、忽视实证以及社会科学化带来的史实贫乏是应当引起注意的^②。

杨念群教授挑战时下中国社会史研究的致命之处，在于质疑流行的区域社会史（地域社会史）研究。他提出：目前中国社会史等于“区域社会史”研究，区域史研究又多趋向于探讨“宗族”和“庙宇”功能的现状，应改变“村落研究取向”，即从“跨区域研究”的角度使社会史研究趋于多元化；应有意识地区别“地方性知识”和“地方感”。“地方性知识”是知识人从思想的意义上进行划分的结果，“地方感”则更接近于精英或底层民众自身的感受，两者不能混淆而应区别对待。如何在尊重既有地方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新理解政治变迁的跨地方性逻辑的问题，以及“政治”在近代的意义，不但要从“地方”的角度加以理解，更应该结合一些跨地区的政治现象如“社会动员”加以解释^③。这种对“地方”的理解与超越“区域社会史”研究的设想，具有启发性。循此“地方”问题意识的思路，朱浒先生进而

^① 孙江《后现代主义、新史学与中国语境》，杨念群等主编《新史学》下册第 675-676 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② 关于后现代史学在我国的情形，可参见杨念群《“后现代”思潮在中国--兼论其与 20 世纪 90 年代各种思潮的复杂关系》，《开放时代》2003 年第 3 期；仲伟民《后现代史学：姗姗来迟的不速之客》，《光明日报》2005 年 1 月 30 日。朱浒《新社会史能否演生范式意义？》（《中华读书报》2005 年 12 月 7 日）在肯定“新社会史”的同时，也提出史学社会科学化的限度问题。

^③ 杨念群《“地方性知识”、“地方感”与“跨区域研究”的前景》，《天津社会科学》2004 年第 6 期。

提出“地方性”也可以打破地方性实践的封闭性，即存在“跨地方的地方性实践”。作者通过考察江南善会善堂向华北的移植现象，认为那种试图通过把握“小社区”内部脉络来分析“大社会”的做法，未免给人以先行画地为牢之感。地方性实践并非不可以跨地方进行，而地方性自身不是不具有自发向外流动的能力。“流动的地方性”这一概念应该有可能为我们的历史认知方式开出一条新的可行途径。自从美国学者施坚雅（William Skinner）使用较为严格的标准将中国分解以来，地方史研究视野中的地方空间呈现出边界越缩越小、封闭性越来越强的趋势，“破碎的历史”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而地方史研究者们也大多失去了对社区外部的穿透力。目前，无论是所谓的“华北模式”、“江南模式”、“关中模式”还是“岭南模式”，显然都不能代表中国社会变迁的基本方向。而如果转换一下思路，注意到存在着“流动的地方性”这一线索，那么这些模式各自拥有的合理之处或许能够有杂糅到一起的可能性，因为它们不仅是共存于一个更大的独立空间而且是互动的。因此，这个概念具有在更广阔的范围内进行进一步检验的价值^①。虽然朱浒采用的方式与杨念群重提“政治史”的“意识形态”再研究、“社会动员形态”的研究^②不同，但是“打破地方性实践的封闭性”的目的是一致的，可谓殊途同归。

其实，区域史研究的终极追求从来不是画地为牢，而是探索“中国社会变迁”。早在区域史研究的倡导者施坚雅那里就是如此，1984年他在就任亚洲研究协会主席的演讲词中指出：“中国历史结构”是一个由网络相连接地方史和区域史所组成的层次结构，它们的作用范围体现在人类相互关系的空间形式之中；在每一层次上，某特定的区域体系的关键时间结构都是持续不断的周期性插曲。认为这样一种历史研究的视角，促使我们思考怎样把微观考察和宏观透视结合在一起，怎样把局部地方史与大型区域史联系起来，怎样把各个分离的事件与持久性活动的相应结构联系起来加以研究。“只有在一个富有意义的整体中加以详细阐述，才能揭示地方史学者研究成果的真正意义。”^③可见区域史研究追求将地域空间转化为社会历史的时间，从空间与时间的组合打破传统历史的单一时间观与历史演化模式。优秀的中国区域社会史学者也有区域史研究的反思能力与理论自觉，如刘志伟教授不拘泥于行政区划或根据地理特征划分的区域，强调“区域史研究的人本主义取向”，他认为：“在历史认识中的地域观念，不只是历史学家为研究的方便而划出来的范围，更是人们在自己的历史活动过程中划出来的历史的和流动的界线，历史学家的睿智是将这种流动性呈现出来。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以研究人的活动、人的精神以及他们的生存环境的互动过程为中心，通过人的历史活动去把握历史时空的互动关系，而不是把历史时空固定化、概念化之后，再作为研究的出发点。”^④这是活的区域史研究的主张，以求得历史的真谛，其中“流动的界线”或许就有“打破地方性实践的封闭性”的含义。

如果说刘志伟的这一观点还有区域内局限的话，那么另一位华南研究学者科大卫教授则也从事“跨区域”的工作。在庆祝华南研究会成立十周年会议上，这位华南研究的先行者与理论家，出乎意料地提出了“告别华南研究”。早在1986年就已出版《中国乡村社会的结构：香港新界东部的宗族与乡村》的科大卫，谈到1989年开始与大陆学者合作的新项目时说：“我开始考虑到，怎样从地方史可以归纳到对整个中国历史有关的结论。我以为办法就需要多作地点上的个案研究，需要比较不同地点的经验，才可以脱离一个以长江下游作为典型的中国社会史。”他的目光早就张望华南以外的地区了。科大卫还说：“我怀疑我们从香港研究出发的几个人，在1990年以前，都是比较狭窄。我们一直以来研究香港新界及珠江三角洲，

^① 朱浒《跨地方的地方性实践——江南善会善堂向华北的移植》，《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6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2月版。

^② 杨念群《重提“政治史”研究》，《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

^③ 施坚雅《中国历史的结构》，施坚雅著、王旭等译《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第22页，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④ 刘志伟《引论：区域史研究的人本主义取向》，载姜伯勤著《石濂大汕与澳门禅史——清初岭南禅学史研究初编》，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对其他地区没有很多了解。”“地方社会的模式，源于地方归纳在国家制度里面的过程。国家扩张所用、地方社会接纳的理论，就是地方社会模式的根据。”“从理性方面来想，也知道现在是需要扩大研究范围的时候。从华南的研究，我们得到一个通论，过来的工作就不是在华南找证据。我们需要跑到不同的地方，看看通论是否可以经得起考验。需要到华北去，看看在参与国家比华南更长历史的例子是否也合乎这个论点的推测。需要跑到云南和贵州，看看在历史上出现过不同国家模式的地区（我是指南诏和大理），如何把不同国家的传统放进地方文化。我们不能犯以往古代社会史的错误，把中国历史写成是江南的扩大面。只有走出华南研究的范畴，我们才可以把中国历史写成是全中国的历史……我们最后的结果，也不能是一个限制在中国历史范畴里面的中国史。我们最终的目的是把中国史放到世界史里，让大家对人类的历史有更深的了解。”^①这种区域研究既有社会也有政治，不仅“跨区域”而且“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我们大可不必担心他们会画地为牢，自我封闭。当然，“华南研究”属于区域研究的先行者与成功者，其他区域的研究未必能有这种雄心壮志与学术水准。

杨念群直击区域史研究“命门”的，是点出区域社会史研究多趋向于探讨“宗族”和“庙宇”功能及采取“村落研究取向”。他套用其他学者高度概括的说法，现在的社会史研究是“进村找庙”。话虽失之于简，但也切中要害，与实情八九不离十。如果我印象没有错误的话，华南研究者的社会史研究成就也主要体现在宗族与民间信仰（庙宇是其象征）方面，其他社会史学者的研究也与“宗族”和“庙宇”密切相关。不过对这种学术侧重，应当从学术发展脉络来认识。前引科大卫先生的文章转入正题就讲：“谈到理论，可以说华南研究深受人类学者弗里德曼和华德英的影响。”事实上，弗里德曼作为汉人人类学的重要开拓者与宗族研究的先行者，几乎影响了整个汉人人类学研究。中国的汉人人类学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发生了重大变化，大陆的人类学被民族关系取代，台湾的人类学研究集中在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与台湾大学人类学系，中研院民族所制定汉人人类学研究规划时，认为宗族与民间信仰在中国社会最具特色，是认识中国社会特质的重要方面，于是将这两个方面作为研究重点。当时由于大陆关闭了外国学者来华研究的大门，国外的人类学家于是选择台湾、香港进行研究，这也影响了台港人类学学者的研究取向与问题意识。大陆改革开放以后，海外学者有机会进入大陆研究，也带来了过去关心的研究课题。就大陆历史学界而言，宗族问题受到重视，这同批判“封建族权”有关，而且一开始就具有政治社会史的味道，并显示出重视历史整体性的研究取向。新时期社会史研究复兴之初，为了避免纠缠于概念之争，采取了首先从公认的社会史领域如家庭、宗族等社会组织与绅士商人等社会群体入手的方法进入，宗族研究取得可喜的进展。郑振满教授《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一书前言的学术史回顾，除总结史学界的研究成果尤其是继承老师傅衣凌教授的乡族论外，还论述了人类学者特别是台湾人类学者对于中国家族组织的研究，接续了台湾人类学者对于宗族研究的传统。该书用宗法伦理庶民化、基层社会自治化、财产关系公有化，概括宋以后家族组织与传统社会的变迁。其研究远不是村落宗族研究具有的地方性所能概括的。科大卫也“发现宗族制度演变的因素不只在民间，而同时在朝廷的政治，使我知道研究社会史不等于逃避政治史。”“我对研究这个社会史的方法概念大概是这样子：在珠江三角洲，基本上我们掌握了明代宗族制度几个主要的演变。在明初，通过里甲制度政府承认了地方社会；通过家庙的兴建，族谱的传播，宗族变成了社会上的核心机构；宗族再从核心的地方机构演变为田土开发的控制产权机构。在年份上，里甲发展，主要在明初到黄萧养之乱（约15世纪中），家庙的兴建开始在嘉靖（16世纪中）。我既然假设里甲是宗族制度的前身，所以应该找不同的地方，探讨由里甲演变到宗族的过程，从比较中了解这个发展的通义。我们研究莆田、潮州和珠江三角洲三处，刚好可以做这个比较。”所以他研究珠江三角洲的宗族的目的是要认识中国社会的演变。

^① 科大卫《告别华南研究》，《学步与超越：华南研究会论文集》，香港：香港文化创造出版社2004年版。

关于“庙宇”研究，社会史学界开始于新时期的华南学者。1992年第四届社会史年会在沈阳举行，华南学者陈春声、刘志伟、罗一星、郑振满为会议带去结合民间信仰的地域研究的新风^①，作为“进村找庙”的先驱性研究是陈春声、陈文惠《社神崇拜与社区地域关系——樟林三山国王的研究》，刘志伟《神明的正统性与地方化——关于珠江三角洲北帝崇拜的一个解释》，郑振满《神庙祭典与社区发展模式——莆田江口平原的例证》^②等论文，这些研究者之所以关心“庙宇”，在于试图把握民间信仰与社区发展的关系，不仅赋予地方史以文化性，也对传统从宗教或风俗的角度研究信仰赋予地域史的整体性，而且试图在地域史的探讨中把握基层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具有突破性，他们影响了后来的地域史研究^③。虽然他们早期的研究重点在本区域内，到了“告别华南研究”的今天，归宿指向了中国通史。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华南区域研究不是画地为牢，他们的研究有可能从新的视野揭示中国历史的变化及其内在机制。同时也不否认全国研究区域史的水平并不一致，写出如上诸多文字是希望后来的区域社会史研究者走出自己的路。就目前区域社会史的研究现状而言，距离认识整个“中国社会变迁”还有相当的路程要走，这是因为不少区域社会史研究需要深入，许多区域社会史研究才刚刚开始，还需要大量研究成果的积累。

杨念群教授对区域社会史的质疑，提示区域史研究者要有更大的学术目标与追求，这是有意义的。而他另辟蹊径，重提政治史，试图跨越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局限性，有助于反思区域社会史研究并寻找新的出路。我想，社会史研究特别是要认识“中国社会变迁”，区域社会史在这方面并不是万能的，但是如果少了区域社会史（地域社会史）研究也是万万不能的。我们应当对区域社会史研究的有效性有充分的认识与自信，同时也应当对区域社会史研究的限度进行深刻的反思与自觉。

这里我们需要对几个概念加以说明，区域研究一般是指美国学者施坚雅倡导的将中国分区研究，而地域研究通常是指将历史放在特定空间的“场”，即地方社会关系网络中认识，或者说就是将历史放在地方社会脉络与背景中认识。地域研究可以表现为大小不同的区域，如特定地区或行政建制的省府县或自然村落。现在流行社区研究，往往以村落为主。地方史原指比较传统的史志研究，现在赋予新学术追求的地域研究有时也往往称之为地方史。区域史、地域史、社区史可以混称为地方历史，其间有所区别。“进村找庙”可以狭义理解为村落史、社区史，也可以广义理解为为研究区域是寻找资料与灵感。本文讨论的“区域史”可以作为地方历史来理解，其中包含若干层次。有的学者比较强调地方历史不同地理空间的区分，如林济教授总结宗族研究的方法论时说：“在目前重视社区个案研究的情况下，我仍然相信区域社会文化研究的不可取代的学术价值，因为中国社会文化极其复杂，它不是一种社区文化的简单相加，区域社会文化研究可以通过比较、综合的方法得出一些有益的见解。”^④

赵世瑜教授针对社会史研究经过近20多年的发展，就社会史今后的开展，提出从学术史的脉络加以厘清，以便从新旧观念错综交糅的混乱中认清方向。他特对传统史学、对曾与社会史相对立的政治史研究主题反思，思考其与社会史的关系；并且思考社会史研究的方

^① 张炳武主编会议论文集《中国历史社会探奥》收入了刘志伟《祖先重构及其意义》、罗一星《佛山祖庙与佛山传统社会》、陈春声、陈文惠《社神崇拜与社区地域关系》等文的缩写稿，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② 陈文、刘文均载《中山大学史学集刊》第二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郑文载《史林》1995年第1期。

^③ 影响较大的论文还有陈春声的《信仰空间与社区历史的演变——以樟林神庙系统的研究为中心》，《清史研究》1999年第2期；《正统性、地方化与文化的创制——潮州民间神信仰的象征与历史意义》，《史学月刊》，2001年第1期；《乡村的故事与社区历史的建构——以东凤村陈氏为例兼论传统乡村社会研究历史记忆问题》，《历史研究》2003年第5期等文。郑振满、陈春声主编的《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则是这一领域的重要论文集。

^④ 林济《长江流域的宗族与宗族生活》后记，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式与表达途径等问题，发表《社会史研究向何处去？》^①一文，其中有不少内容是从杨念群教授提出的问题引申开来的。赵世瑜强调要与传统史学对话：“如果我们无法另辟蹊径，从不同的问题意识或方法论出发，去探索和回答传统史学所重视的问题，我们就无法在与传统史学的对话中前进，我们也无法使传统史学心服口服地接受社会史研究的取向和成果。如果是那样的话，社会史研究的意义将是有限的。”同时他也主张反思政治史：“社会史需要通过自己的独特努力，对以往的许多政治史研究的概念工具进行反思，比如如何评价“阶级斗争理论”的有效性，如何认识“专制集权”，如何理解“革命”和“改良”，等等。社会史与政治史关系的把握，也直接影响到社会史与法制史的关系、经济史与政治史的关系等等。前者需要我们以更广阔的视野去重新分析那些脍炙人口的事件和制度，比如从生态的、工商业的、族群的、甚至文化传统的因素考察动荡或承平时期的民众运动；后者则需要我们摆脱单一决定论的思维定势，以问题而非学科分支的人为限定为思考的起点，权力、公正、公平、正义、公与私或者传统概念中的礼、法、俗、教化等等，就会成为我们共同的关注点。”对于社会史研究的方法与表达，特别针对叙事复兴问题，提出：“讲故事在历史叙事中的重要性就不在于“故事”及其情节本身，而且在于“讲”，即社会史家如何通过选择故事、叙述情节、建立故事与其背后的社会-文化体制的关联，来构造一条叙事逻辑。当我们着眼于具体的历史情境，以图把握某种历史发展的内在脉络的时候，“讲故事”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赵世瑜的上述论述，是值得认真思考的^②。

新的社会史理论探讨，也带来对社会史史料的新认识。冯尔康先生提出社会史史料学的概念^③，认为“新概念、新方向、新领域是开启社会史史料宝藏的钥匙”^④。郑振满教授认为，广泛搜集和充分利用民间文献，是新史学发展的前提条件和必由之路。这体现在：从文化遗产的理论高度，将民间文献的搜集与解读纳入同一学术视野，以推进本土社会科学发展的突破点，进行跨学科合作研究，建设大型数据库与文献检索系统^⑤。中国社会史学会第11届年会的主题为“地域中国：民间文献的社会史解读”，也反映学会对于民间文献社会史资料价值的重视。现在社会史的史料来源被大大拓展了，连漫画也成了史料来源^⑥。

社会史史料越来越受到重视，整理工作成绩可观。文书是重要的民间文献，地域性特点比较突出，整理进展较大。1975年出土的睡虎地秦简《日书》内容丰富，涉及宗教、社会、民俗、思想、经济、政治等许多领域，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近年来出版了几位学者多年考释文献的专著^⑦。敦煌文书中社会史资料丰富，是研究中古社会的重要资料^⑧。宁可与郝春文《敦煌社邑文书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赵和平《敦煌表状笺启类书仪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均是整理者多年研究的成果。郝春文主编《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共三十卷（已出版3卷，分别由科学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2001年、2003年出版），目前还主持“敦煌社会史史料汇编”的整理工作。徽州文书的整理更加规范，刘伯山主编的《徽州文书》第一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共计十卷，收入的是归户的文

^① 《河北学刊》2005年第1期。

^② 赵世瑜最近的社会史研究思考，还可参考梁勇与他的访谈对话，见赵世瑜、梁勇《政治史·社会史·历史人类学——赵世瑜教授访谈》，《学术月刊》2005年第12期。

^③ 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为此于2004年9月17日—19日举办了“中国社会史史料研讨会”，参见李然所写会议概述，载《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会议部分论文刊登在《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七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

^④ 冯尔康《中国社会史概论》第134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⑤ 郑振满《民间历史文献与文化遗产研究》，《东南学术》2004年增刊。

^⑥ 小田《漫画：在何种意义上成为社会史素材——以丰子恺漫画为对象的分析》，《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1期。

^⑦ 主要有刘乐贤《睡虎地秦简日书的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吴小强《秦简日书集释》，长沙：岳麓书社2000；刘乐贤《简帛数学文献探论》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王子今《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疏证》，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⑧ 张国刚《敦煌文献与中古社会研究——纪念敦煌石室遗书发现百年》，《光明日报》2000年6月23日。

书五千多份。明清民间文书受到重视^①，利用文书的一些研究成果很有特色^②。碑刻具有纪念意义，史料价值较高，出版了数种资料集。郑振满、丁荷生编纂《福建宗教碑铭汇编》，继兴化府分册（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5）后，又推出泉州府分册（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3）大型史料集。泉州府分册计上、中、下三大册，影印历史上的泉州府地区有关儒、释、道、摩尼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祖先崇拜、地方神崇拜等广义宗教的碑铭资料。取材于历代地方志、金石志、寺庙志、水利志、文集、族谱以及实地考察所获得的田野资料。王国平、唐力行主编《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苏州大学出版社 1998）收录碑刻范围比较广阔，按照社会史问题分类是其特色。东岳庙北京民俗博物馆编、赵世瑜主持辑录并审订《北京东岳庙与泰山信仰碑刻辑录》（中国书店出版社 2004）辑录了自元代赵孟頫书《张公碑》至民国三十一年各时期碑刻，共 275 通。其中大部分是北京东岳庙的（142 通），此外还有妙峰山、丫髻山、五顶以及散在各处的。该资料为研究北京地区的民间信仰与社会提供了便利。档案方面，马敏、祖苏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二辑（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九年）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年出版。冯尔康教授的《2004 萧公权学术讲座》^③出版，收录了冯先生演讲报告《乾嘉之际下层社会面貌——以嘉庆朝刑科题本档案史料为例》^④，探讨了利用清朝刑科题本进行社会群体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新时期社会史理论的探讨，使我们越来越树立起多元视野，中国社会史理论更具开放性^⑤。

二、社会史研究：探索与收获

新时期社会史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我对 1998 年以前新时期中国社会史研究的著作已有比较全面的介绍^⑥，这里侧重对此后的社会史研究重要领域与成果加以评述。

（一）社会史的综合研究

新时期社会史研究经过较长时间的讨论与成果积累，出版了一些对社会史整体思考的著作。冯尔康教授《中国社会史概论》从社会史研究历程的角度探讨社会史学科建设的一系列理论问题，阐释社会史的研究对象、特点、方法和功能；提出加强社会史史料学的研究，并把它视为社会史研究的重要理论组成部分；论述了中国古代、近代（前期）社会结构及演变；并以饮食、生育、丧葬、节庆为例描述古代社会生活方式和社会风俗^⑦。周积明、宋德金主编《中国社会史论》（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0）凝结了中国社会史学界众多学者的心血，分社

^① 《史学月刊》2005 年第 12 期发表一组“明清契约文书与历史研究笔谈”，包括陈支平《努力开拓民间文书研究的新局面》、栾成显《明清契约文书的研究价值》、陈学文《土地契约文书与明清社会、经济、文化的研究》。

^② 栾成显《明代黄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陈支平《民间文书与明清赋役史研究》，合肥：黄山书社 2005 年版；郭松义、定宜庄《清代民间婚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③ 萧公权学术讲座是由台湾的纯智文教基金会赞助，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办，自 2001 年起，每年由近史所遴选一位国际知名学者担任讲座，用以提升近代史研究，并纪念萧公权先生。2001 年度由著名历史学家何炳棣开讲。2004 年 10 月 21-22 日冯尔康教授受邀进行了演讲。

^④ 嘉庆朝刑科题本社会史史料整理，作为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中国社会史资料辑刊》计划，已整理完毕，将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⑤ 2003 年 11 月 24 日—25 日，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举办了“多元学科视野下的中国社会史研究”讨论会，与会者有此共识。《天津社会科学》组织了“多元学科视野下的中国社会史研究”笔谈，刊载于 2004 年第 3 期，发表了萧延中《社会史研究中三个可能被“误读”的等号》、钱杭《谈“多元”视野》、常建华《东亚社会比较与中国社会史研究》三文以及郭玉峰写的会议综述。

^⑥ 常建华《20 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周积明、宋德金主编《中国社会史论》第 190-216 页，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该文收入常建华《社会生活的历史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⑦ 冯尔康《中国社会史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年版；该书是教育部普通高等教育“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也是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重大项目“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成果之一。

会史的理论和方法、中国社会史的基本问题、阶段性问题、区域社会史的个案研究四编，集中了所探讨领域的专家，论述具有深度。以上两部书可供高校历史学、社会学等相关专业教学使用，也可供研究者参考。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1 年出版了陈高华、徐吉军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风俗通史》^①，主要论述衣、食、住、行、婚育、丧葬、生产、节日、游艺等方面的社会风俗，可以视为一部社会生活史。何怀宏《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秦汉至晚清历史的一种社会学阐释》（三联书店 2004）承解释春秋时代的“世袭社会”概念提出“选举社会”的基本概念，用来解释中国在秦汉至晚清的历史发展中的社会结构，解释一个有别于春秋战国之前的“古典中国”（classChina），也有别今天“现代中国”（modernChina）的“传统中国”（traditionalChina）。王家范《百年颠沛与千年往复》（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1）论文集，探讨的问题有中国社会的结构与变迁，宗教气质与精神状态，土地关系与土地问题，经济变迁与道德理想，晚明江南士大夫的历史命运等等。

断代性研究方面，马新、齐涛著《中国远古社会史论》（科学出版社 2003）论述的问题有：冰川时代与文明的萌生，中国的洪水传说与创世纪，自然环境的变迁与远古经济的发展，远古崇拜与信仰的演进，原始聚落的发展，聚落的分化与消亡，群落与方国，群系的变迁与方国联盟的形成。这样的研究框架具有创意。何怀宏《世袭社会及其解体：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代》（三联书店 1996）提出以“世袭社会”的解释性范畴描述和分析中国春秋时代的社会结构（或可上溯到西周乃至更早）。所依据的标准就是看社会提供给个人的上升渠道和发展条件，看在这个社会中生活的人们有多少实现和发展自己的机会。对春秋时代中国社会的结构及其变迁提出另一种观察角度和解释框架。晁福林《先秦民俗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以衣、食、住、行习俗为线索，分析了礼与俗、民俗形成与社会物质生活状况、各阶级的崇拜、禁忌、巫术与信仰等的关系，将民俗学与历史学结合在一起。他的《先秦社会形态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对老问题进行了新探讨。李振宏《居延汉简与汉代社会》（中华书局 2003）研究了汉代的屯戍管理制度、吏卒社会生活、汉简问题考证、西汉官吏立法、汉代地价。冻国栋《中国中古经济与社会史论稿》（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5）深入探讨了有关户籍、人口、大姓、家族、工匠、职业分工、社会观念、风俗等问题。牟发松主编《社会与国家关系视野下的汉唐历史变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收录 34 篇论文一篇综述，从多方面反映了中国时期的社会历史^②。谭蝉雪《敦煌民俗》（甘肃教育出版社 2006）论述了中古时期的经济生活、日常生活、岁时节日、婚姻嫁娶、继嗣养鱼、丧葬斋忌。卢向前主编《唐宋变革论》（黄山书社 2006）对中国古代史关注的唐宋之际的社会变迁进行了探讨。林正秋著有《宋代生活风俗研究》（中国商业出版社 1998）一书。张国庆《辽代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探讨了辽代的疆域与环境、户口、社区、家庭、社会阶层与社会群团、社会物质与精神生活方式、社会激励与社会保障、社会问题与社会调控等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新近出版陈宝良著《明代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该书分别论述上层社会与社会下层的生活，衣食住行，冠婚丧祭，宗教信仰，节日与仪式，休闲与娱乐，社交礼仪等。讨论了伦理性与等级性，商业化与世俗化，艺术化生活风尚，秩序危机与“近代性”，反映出作者对于明代社会生活史特点的认识。万明主编《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商务印书馆 2005）注重社会整体结构的变迁，选取了人口、商业、货币、城乡社会、法律、军事、社会保障、政治、思想文化、内外互动关系等专题进行论述。冯尔康教授长期致力于社会史研究，尤精于清代，《顾真斋文丛》（中华书局 2003）收录了 36 篇论文，内容侧重在阶层与社会经济结构，社会群体，区域社会，社会问题四方面。他还著有学术普及性著作《清人生活漫步》

^① 其中各卷与执笔者为宋兆麟：原始社会卷，宋镇豪：夏商卷，陈绍棣：两周卷，彭卫、杨振红：秦汉卷，张承宗、魏向东：魏晋南北朝卷，吴玉贵：隋唐五代卷，宋德金：辽金西夏卷，徐吉军、方建新、方健、吕凤棠：宋代卷，陈高华、史卫民：元代卷，王熹：明代卷，林永匡：清代卷。

^② 这是 2004 年 10 月 22 日至 24 日在华东师范大学召开的“社会与国家关系视野下的汉唐历史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反映了对于中古时期社会史研究的重视。

(中国出版社 1999) 一书。常建华《清代的国家与社会研究》(人民出版社 2006) 一方面比较关心国家的社会政策、国家的社会性质、国家政令在地方的执行情况、官书中所反映的地方情况; 另一方面从地方志探讨风俗入手, 研究清人社会生活, 并从风俗习惯透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探讨了清朝政纲、宗族与国家的关系、清朝的民生对策、社会问题与对策, 本书涉及咽喉、老瓜贼、僧道等群体, 还研究了岁时节日、火葬、溺婴、乡绅等问题。高翔《近代的初曙——18 世纪中国观念变迁与社会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分为时代与问题、理欲之争与生活方式的变迁、学术观念的多元化趋势、政治观念的变迁、时代精神与社会发展五章。秦宝琦、张研两教授《18 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社会卷》(辽海出版社 1999), 论述了这一时期的社会环境、社会结构、秘密社会、士绅阶层。此后张研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19 世纪中国社会研究”, 出版了系列成果^①, 比较全面地揭示了 19 世纪的中国社会。在对明清时期进行的综合研究中, 吴承明著《中国的现代化: 市场与社会》(三联书店 2001) 是作者以往在中国现代化理念关照下所撰一系列有关明清市场及其与社会经济关系论文的结集。作者认为, 经济史研究中最重要的是新的经济因素及其运行方式的出现与发展。如果这种新的经济因素大量地、集中地出现, 而且其发展趋势不可逆, 那么它就是现代化因素。这种新的经济因素, 比如引发适合于它的制度上的变革, 这样它才能持续发展, 否则就会被旧的僵化了的制度所扼杀。而新的经济因素及由此而来的制度变革, 必然反映到社会上, 引起社会结构、家族制度、等级和群体权利、人们行为和习俗的变迁。王日根《明清民间社会的秩序》(岳麓书社 2003) 所收论文分为明清民间社会秩序的考察, 义田与民间社会秩序, 会馆与民间社会秩序, 会社与民间社会秩序, 家族与民间社会秩序, 商业与民间社会秩序六组。作者试图说明明清时期中国传统政治文明中的“官民相得”倾向日益成型, 并有效地维持着中国社会向前发展。

近现代的研究方面, 近代社会史在人口、风俗习尚、日常生活、妇女、赈灾等方面成果较多^②。王先明《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论》(人民出版社 2000) 以及“续论”(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5) 以近代乡村社会结构和传统文化结构变迁与转型为研究重点, 并力求从中理解二者的相关性和互动性, 试图从结构的深层变动去探寻近代中国历史演进的轨迹、特征与规律。内容包括乡村社会结构与社会控制、近代社会流动与结构性变动、社会转型与乡村权力结构、西学冲击与传统文化结构等。张静如《中国现代社会史》(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4) 是作者在其之前主编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社会之变迁》和《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中国社会之变迁》的基础上, 对原书进行修改、调整、补充的新作, 从经济、政治、教育文化、阶级与阶层、社会组织、家庭、社会习俗等方面展示了中国现代社会的风貌。唐力行主编《国家、地方、民众的互动与社会变迁》(商务印书馆 2004) 是 2002 年举行的第九届中国社会史学会年会的论文集, 论文集选取了有关中国近现代史方面的论文 46 篇, 探讨了近现代社会多方面的问题^③。还有一些论文集讨论了近代中国的观念与思潮^④。魏光奇《官治与自治——20

^① 共计 6 种书, 即张研、毛立平《19 世纪中期中国家庭的社会经济透视》、张研、牛贯杰《19 世纪中期中国双重统治格局的演变》、秦宝琦《清末民初秘密社会的蜕变》, 孙燕京《晚清社会风尚研究》、陈桦、刘宗志《救灾与济贫——中国封建时代的社会救助活动(1750-1911)》、郝秉键、李志军《19 世纪晚期中国民间知识分子的思想——以上海格致书院为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2005 年陆续出版。

^② 闵杰《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近代史研究》2004 年第 2 期;《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述评》,《教学与研究》2006 年第 3 期。

^③ 中国社会史学会年会论文集反映了多方面的社会史研究, 近十年所编论文集还有 1996 年重庆第六届年会论文集; 李禹阶、赵昆生等主编《社区·社会·文化——“区域社会比较”国际学术研讨论文集》(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0) 收有 22 篇会议论文, 内容侧重社会史理论、区域探讨、宗族与婚姻家庭、饮食与日常生活等。1998 年苏州第七届年会论文集: 唐力行主编《家庭·社区·大众心态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合肥: 黄山书社 1999) 内容分为理论、家庭、社区、大众心态四部分, 载文 40 篇。2000 年武汉第八届年会论文集: 严昌洪主编《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 2002) 收录了 29 篇论文, 大致可以分为社会结构、社会意识、区域社会、综合议题 4 个部分。

^④ 南开大学近代中国研究中心编《近代中国社会、政治与思潮》,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薛君度、刘志琴主编《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学者呼吁加强现代社会史研

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县制》(商务印书馆 2004)讨论的问题是:中国古代的县制和乡里组织,近代县制改革的酝酿,清末至北洋时期的县制,民国时期的县制,清末至国民政府时期的县财政制度,县政人员的人事制度,县制演进背后的社会变动。梁家贵《抗日战争与中国社会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论述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民间信仰与秘密结社五个方面的问题。张仁善《1949 中国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论述了在国共两大政治势力对垒的夹缝中生活的社会群体如达官贵人、市民、农民、知识分子、学生、媒体工作者、无业流民乃至黑社会成员的生活状况及心理态势。近现代社会史得到加强是近十年的显著现象,这是近现代史学者重视社会史研究的结果^①。

(二) 婚姻家庭、家族宗族的研究

婚姻家庭的研究有突破性进展。婚姻史虽然开展较早,但是比较集中在礼法方面的论述上,缺乏对社会实态的探讨,而家庭史的开展基本上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成立后,首批课题就确立了“中国家庭史研究”,举办了专门的学术研讨会^②,并出版了论文集^③,张国刚教授发表了唐代家庭的系列论文^④。张邦炜《宋代婚姻家族史论》(人民出版社 2003)收录 21 篇论文,内容大致分为婚姻、妇女、家族、皇族四组。作者对宋代社会的研究,旨在说明唐宋时期的社会变迁,为唐宋变革论提供了不少实证研究的事例。邢铁《宋代家庭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分上、中、下三篇,分别阐述了“宋型家庭”的形成和内涵,论述了宋代户等制度对家庭经济的影响,家庭继承与家庭门户传继。清代婚姻家庭研究突出表现在利用档案文书上。韩世明《明代女真家庭形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主要研究了明代女真姓氏及姓氏集团、明代女真家庭、明代女真氏族集团、明代女真血缘集团等问题。郭松义《伦理与生活——清代的婚姻关系》(商务印书馆 2000)以资料雄厚和定量研究为特色,内容涉及婚姻地域圈、婚姻社会圈、婚龄、童养媳、入赘婚、妾、节烈妇女和贞女、妇女再嫁、婚外性关系等问题,是一部富有创见的高质量的学术专著。王跃生《十八世纪中国婚姻家庭研究》(法律出版社 2000)利用清代刑科题本婚姻家庭类二千余件档案进行研究,认为十八世纪中国的婚姻行为具有多样化的特征,即既有女性比较普遍的早婚,又有男性晚婚的大量存在。王跃生《清代中期婚姻冲突透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多角度揭示了家庭的冲突方式,特别是对分爨、分产和立嗣继承的冲突表现加以分析,揭示中国传统社会大家庭难以维系的原因,可见父母兄弟之间的分爨是当时人们缓和家庭矛盾的重要手段。张研、毛立平著《19 世纪中期中国家庭的社会经济透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全书分分家、生育、婚姻、生活(计上、下两章)社交 6 章,附录《19 世纪安徽家庭关系中的冲突与暴力》一文,加深了对家庭经济的认识。他们的著作,极大改变了清代婚姻家庭研究的薄弱状况。当代家庭的研究也有重要成果,孙立坤《河南当代家庭变迁》(人民出版社 2004)论述了河南家庭结构形态及其功能的变迁,家庭与经济,家庭婚育,城乡女性,家庭精神生活和习俗,家庭关系。孙立坤编著《河南当代家庭变迁调查》(人民出版社 2004)这是作者因写作前书的资料集,内容包括:河南省发展概述(1949-2000),

究,如李金铮《中国现代社会史研究刍议》,《光明日报》1998 年 04 月 10 日。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等单位于 2005 年 8 月 9—11 日在青岛大学举行了首届中国近代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主题是“近代中国的城市·乡村·民间文化”,参见吕文浩所写会议综述,载《近代史研究》2006 年第 3 期。学者也呼吁加强现代社会史研究,如郭德宏《社会史研究与中国现代史》,《史学月刊》1998 年第 2 期;李金铮《中国现代社会史研究刍议》,《光明日报》1998 年 04 月 10 日;朱汉国、王印煊《近年来的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研究》,《党史研究与教学》2002 年第 4 期。

^② 2002 年 8 月 10-12 日在南开大学举行了“中国家庭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参见王利华的会议述评,载《历史研究》2003 年第 1 期;2003 年 9 月 12 日至 16 日在山东烟台召开了“中国历代农民家庭规模与农民家庭经济学术研讨会”,参见蒋文迪的会议综述,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 年第 4 期。

^③ 张国刚主编《家庭史研究的新视野》三联书店 2004 年版。

^④ 如张国刚《唐代家庭与家族关系的一个考察——一份敦煌分家析产文书的学习札记》,《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 3 卷,中华书局 2001;《唐代家庭形态的复合型特征》,《历史研究》2005 年第 4 期;《论唐代的分家析产》,《中华文史论丛》2006 年第 1 期。

接受调查的单位和地区简介, 家庭问题调查总体数据, 城市居民家庭调查资料, 农村居民家庭调查资料。

家族的概念多包含家庭与宗族。使用家族概念进行研究的成果不少。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4) 增订本增加了“续编”, 分战国家族形态初探、新刊考古与古文字资料研究二章。刘源《商周祭祖礼研究》(商务印书馆 2004) 对商后期祭祖礼类型的划分标准、商后期与周代祭祖仪式的内容与过程提出新见解, 认为商后期早段(武丁至祖庚时期)商人祭祖的主要原因是出于对死去先人会作祟于生者的畏惧, 但西周贵族祭祖的主要原因则是认为祖先有德, 故可上陟于天、可保佑子孙。李卿《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家族、宗族关系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利用大量的传世历史文献和出土文书、碑刻等资料, 从家庭结构、居住关系、宗族关系与社会生活、宗族关系与社会生活、家族宗族关系对社会的影响五个方面, 对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家族、宗族关系的基本状况作了系统的论述。阎爱民《汉晋家族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对婚姻方式、亲属结构、祭祀礼仪和丧服制度、继嗣制度等深入细致考察, 揭示了汉晋社会是一个新旧制度交替的特殊的社会阶段, 对一些传统研究中的重大政治问题如汉代的外戚专政、魏晋门阀制度等, 给与合理的解释。王力平《中古杜氏家族的变迁》(商务印书馆 2006) 对中古时期杜氏家族各个郡望及其房支历史变迁全面考察, 内容包括杜氏家族的发源, 汉代关中家族的形成, 魏晋南北朝、隋唐的杜氏家族, 杜氏家族不同郡望的家学取向, 家谱与家礼等。蔡东洲《宋代闽州陈氏研究》(天地出版社 1999) 探讨了宋代闽州陈氏的迁徙、房支、遗迹艺文、盛衰等问题。李贵录《北宋三槐王氏家庭研究》(齐鲁书社 2004) 是以北宋为中心对宋代官僚王祐为始的王氏家族的研究, 主要包括王氏家族的政绩、文学成就及家族生活。张杰《清代科举家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利用新出版的大型资料汇编《清代硃卷集成》等资料, 论述了科举家族、经济基础、人文环境、日常生活、社会流动、地域变化、家族影响。相关的研究还有《明清人口婚姻家族史论——陈捷先教授、冯尔康教授古稀纪念学术论文集》(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2)。还有学者进行了中日家族的比较研究^①。

宗族研究走向深入。钱杭《血缘与地缘之间——中国历史上的联宗与联宗组织》(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1), 专门探讨了历史上的联宗现象, 论述了同姓联结、通谱、中国古代世系学、联宗与行辈字号、联宗世系学、同姓与异姓联宗的根据、过程与类型等问题, 认为联宗性的宗族实质上是地域组织。断代的宗族研究方面, 刘正《金文氏族研究——殷周时代社会、历史和礼制视野中的氏族问题》(中华书局 2002) 主要探讨了单氏族、子央氏族、鱼氏族、应氏族、雍氏族、逢氏族、吕氏族、孤竹氏族。崔向东《汉代豪族研究》(崇文书局 2003) 从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入手分析豪族阶层的存在和形态演变; 以王权支配社会为视角, 探讨豪族的特点、内部社会结构及王权支配下的官僚化、士族化。赵沛《两汉宗族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4) 主要论述了两汉宗族的恢复和重建、里居形态、社会结构以及两汉宗族发展的基础和途径。刘驰《六朝士族探析》(中国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2000) 从不同的侧面描述士族, 尤其是北方士族的兴衰过程, 力求从较深的层面来探讨其内在原因。王永平《六朝江东世族之家风家学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3) 在把握世族政治特权、经济地位的基础之上, 论述了江东土著世族的文化面貌。夏炎《中古世家大族清河崔氏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4) 用个案研究的方法, 从整体上把握山东崔氏士族的历史表现和历史地位。郭峰《唐代士族个案研究——以吴郡、清河、范阳、敦煌张氏为中心》(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9) 对唐代著名士族加以探讨。王善军《宋代宗族和宗族制度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0) 论述了宋代宗族制度, 并试图揭示唐宋变革在宗族演变方面的表现。邹重华、粟品孝主编《宋代四川家族与学术论集》(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5) 收录 8 位作者的 14 篇论文, 旨在探讨家族与学术文化发展的内在联系。论述了宋代四川主要家族如闽州陈氏、盐泉

^① 李卓《中日家族制度比较研究》,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

苏氏、成都范氏、华阳王氏、仁寿虞氏等的学术情况，并对这些家族的教育、学术网络和藏书情况进行了综合性的考察。常建华研究宗族就比较关注礼与俗、思想与社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提出“宗族乡约化”的观点，研究的归宿则在于宋以后的社会变迁^①。冯尔康《18世纪以来中国家族的现代转向》^②主要论述了自18世纪至20世纪末三百年以来，中国家族从古老衰败的封建末世向现代社会转型期间的演化过程中，其观念文化方面所发生的潜移默化性的变化，其家族形态和组织形式演变的轨迹。作者提出：近现代家族的政治功能极大地衰退，其社会功能则充分显示出来，家族与政治分离、与政府分离，是20世纪以来家族长存于现代社会的重要原因。当代宗族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肖唐镖等著《村治中的宗族——对九个村的调查与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以参与观察、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等形式，对江西省9个村、安徽省1个村的宗族与治理状况进行全面立体性研究，将其中9个村的个案研究报告收入该书。作者调查的村庄体现出不同的宗族类型，包括强弱分殊、单一宗族、一强余弱、城交杂居单姓异族多性杂居平衡等。书中重点探讨了农村宗族势力消长及其与村治的相互关系，研究宗族对农村民主建设的实际影响。

区域性宗族研究方面，林济对湖北等长江中游地区宗族的研究具有开拓性，著有《长江中游宗族社会及其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长江流域的宗族与宗族生活》（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两部著作，前者从区域史的视角对宗族社会的变迁深入研究，弥补了以往长江中游以及近现代宗族研究德薄弱部分。后者采用族群的概念，追溯明清以前长江流域族群的发展与宋元时期宗族文化的形成；分别论述了苏州、徽州、黄州、巴蜀四个地区的宗族与宗族生活；讨论了长江流域各地宗族结构与宗族文化的特征。认为长江流域宗族文化也是建立在自身文化传统发展基础之上；长江流域宗族结构是建立在各地不同的社会经济结构基础之上；长江流域宗族组织是在专制王权及士绅商人力量作用下形成。赵华富《徽州宗族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对徽州宗族的兴起、组织结构、祠堂和祖墓、谱牒、族产、族规家法、重教崇文的传统、经商的风尚全面论述，还有个案研究。吴仁安《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著姓望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江庆柏《明清苏南望族文化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是两部研究江南望族的重要著作。刘志伟提出珠江三角洲宗族的国家认同问题，他以族谱为例，揭示宗族历史的叙事结构及其意义，并探讨广东族谱中的口述传统，指出：“我们看到地方社会文化认同的一种表达方式，就是用一种不合乎士大夫的价值和规范的行为，去建立以士大夫文化为指向的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他与科大卫还讨论了宗族意识形态向地方社会的扩张和渗透，宗族礼仪在地方社会的推广，把地方认同与国家象征结合起来的过程^③。北方宗族长期缺少研究，秦燕、胡红安著《清代以来的陕北宗族与社会变迁》（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2004）难能可贵。该书论述了清代陕北宗族的形成，陕北宗族的结构与功能、继承、村落的经济生活、与国家政权关系，宗族文化的陕北地方特点，社会变革与陕北宗族的弱化，改革开放与陕北宗族的复兴等问题。

（三）社会分类与结构的研究

包括专题和综合两方面。综合性的研究有张泽咸《唐代阶级结构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王曾瑜《宋朝阶级结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均是作者多年的研究成果，细致探讨了当时的各色人等。李伯重也论述了唐代社会等级问题^④。李天石《中国中古良贱制

^① 常建华《宗族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明代宗族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②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此为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组织的家庭、家族、宗族研究系列之一，同时推出的还有李卿《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家族、宗族关系研究》、阎爱民《汉晋家族研究》、邢铁《宋代家庭研究》、常建华《明代宗族研究》等。

^③ 刘志伟《附会、传说与历史真实——珠江三角洲族谱中宗族历史的叙事结构及其意义》，载上海图书馆编《中国谱牒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刘志伟《族谱与文化认同——广东族谱中的口述传统》，载上海图书馆编《中华谱牒研究》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英]科大卫、刘志伟《宗族与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明清华南地区宗族发展的意识形态基础》，《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

^④ 李伯重著《千里史学文存》（杭州出版社2004）收录13篇论文，内容分为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人

度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探讨了中古良贱身份制度产生、发展、演变、衰落的历程。章开沅、马敏、朱英主编的《中国近代史上的官绅商学》(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0)考察官绅商学四个近代活跃群体的形成演变及其互动关系,以探讨特定历史时期社会转型的特征,其中既有丰富具体的社会生活内容,又有社会历史趋向的总体把握,是著者多年来潜心研究的一个总结。清末民初,中国城市社会群体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传统社会结构之外产生出新的社会群体,如买办、企业家、职员、文教工作者、自由职业者、工人、城市贫民等;传统社会结构中原有的官僚、手工业者、商贩等群体身份地位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李明伟《清末民初中国城市社会阶层研究(1897~192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将清末民初城市各类群体划分为官僚阶层、买办阶层、企业家阶层、城市知识阶层、城市中等市民阶层、下层市民阶层、工人阶层、贫民阶层等八大阶层,探讨了城市各阶层的具像与特征。有关社会结构的研究在持续进行^①。

专门的研究以妇女史与性别研究的进展突出。杜芳琴的研究引人注目,她的《发现妇女的历史》、《中国社会性别的历史文化寻踪》(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1998)是两部中国妇女史的论文集。杜芳琴、王政主编《中国历史中的妇女与性别》(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4)是一部专题性的女性史,收录了有关专家的论述,计有赵宇共的“史前时期的社会性别:多学科的历史考察”,杜芳琴的“父系制延续与父权制建立:夏商周妇女与社会性别”,高世瑜的“中古性别制度与妇女”,邓小南的“‘内外’之际与秩序格局:宋代妇女”,臧健的“宋元至明清时期族规家法与两性关系”,定宜庄的“清代妇女与两性关系”,吕美颐、郑永福的“近代中国:大变局中的性别关系与妇女”。李小江主编《历史、史学与性别》(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2)是一部重要论文集,收集了众多社会史学者的作品,表明社会史学者对于性别史相当关注。王子今《古史性别研究丛稿》(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用性别研究的方法分析了先秦至汉晋的一些神秘主义文化现象,包括鲁迅所说的“巫风”和“鬼道”。秦汉时期的性别关系,特别是女性作为社会角色在当时的特征和影响。作者利用张家山汉简和走马楼吴简等新发表的出土资料,对社会历史进行了多方位的性别考察。从性别关系的分析入手对文学史料进行的相关研究,也是有意义的尝试。曹兆兰《金文与殷周女性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商周三代是女权旁落、男权兴起并演进的关键时期,作者从政治、经济、社会和家庭婚姻等多角度,论述当时的女性活动的环境与女性地位变迁的轨迹,说明女性问题产生的社会根源。段塔丽《唐代妇女地位研究》(人民出版社 2000)从女性视角出发,关注唐代妇女的主体性,论述了妇女由为人女、为人妻到为人母的角色转换以及社会参与、婚姻家庭、文化教育、体育锻炼、文化价值等问题。邓小南主编《唐宋女性与社会》(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3)所选论文分为“文本:性别的表现与解读”、“女性书写:闺训与篇什”、“女性生活:门内与户外”、“图像:风格与风貌”、“性:身体与文化”、“宗教:信仰与供奉”、“性别意识:认同与错位”、“变迁:性别与社会”八类。一方面是关注对象的接近,另一方面又充分体现出研究视角和方法理路的多元。沈海梅《明清云南妇女生活研究》(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1)主要研究了云南的列女群。定宜庄《满族的妇女生活与婚姻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研究深入,她的《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9)则是采用新研究方法的尝试。陆德阳、王乃宁《社会的又一层面:中国近代女佣》(学林出版社 2004)论述了自 1840 年至 1949 年的旧中国女佣的产生、生活以及与社会各阶层的关系。常建华《婚姻内外的古代女性》(中华书局 2006)对女性问题有所考辨。

口史四类,属于社会史的 4 篇论文讨论了唐代社会等级的划分与命名以及部曲、奴婢问题,文化史的论文研究马祖形象的演变,人口史的论文论述了人口与气候变化的关系,还有一篇讨论妇女史的短文。

^① 由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于 2005 年 8 月 22~24 日主办的“近五百年来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国际学术讨论会,研讨了社会结构的特征及其变迁、经济发展与社会结构变动、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社会流动与社会分层、城市社会结构、国家与社会结构变动等问题,参见王先明、魏本权的会议综述,载《史学月刊》2006 年第 3 期。

士大夫与知识分子问题受人重视。孙立群《中国古代的士人生活》(商务印书馆 2003) 内容为中国古代士人概说, 士人的读书生活, 士人与仕途, 士人的衣与食, 士人的住与行, 士人与聚会、结社, 士人与琴棋书画, 士人与青楼女子, 魏晋士人的生活。蔡锋《春秋时期贵族社会生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通过对先秦典籍、古文字、田野考古资料的综合分析, 探讨了先秦春秋时期富有代表意义的贵族阶层亦即卿大夫士的生活。王永平《中古士人迁移与文化交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从中古江淮之间士人流动与文化交流透视了学术文化的传播。陈宝良《明代儒学生员与地方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分为两编: 上编儒学生员与明代学校、科举, 包括明以前历代教育概况, 明代的学校, 生员的种类与人数, 生员的考取与课试, 生员的仕进之途; 下编儒学生员与明代社会, 包括章生员层的社会职业流动, 生员与地方社会: 以政治参与为例, 生员的无赖化, 生员的经济地位, 生员生活与明代学术。学术界有关明代的生员论述虽多, 但是缺乏专深的研究, 该书史料丰富, 是一项扎实的研究成果。吴震《明代知识界讲学活动(1522-1602)》(学林出版社 2003) 叙述的主要是有关思想家个人或一般绅士文人的社会活动、私人交往以及他们在地域社会的建设、道德理想的宣传等。作者认为, 深入研究发生在中晚明时期的、主要以阳明学话语背景之下的讲学活动, 对于把握当时知识界的思想动向以及 16-17 世纪的社会文化特质是有益的。徐茂明《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1368-1911)》(商务印书馆 2004) 绪论部分全面综述了海内外明清(含近代的绅士) 研究状况, 论述了江南士绅与明清专制皇权, 江南士绅与社会基层组织, 江南士绅的文化权力与社会保障功能, 江南士绅的家族迁徙与区域文化互动——以清代苏州大阜潘氏为例, 近代社会变迁中的江南士绅。许顺富《湖南绅士与晚清政治变迁》(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4) 论述了湖南绅士在近代历次社会运动中的表现与作用。李世众《晚清士绅与地方政治——以温州为中心的考察》(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重点探讨了晚清地方官与士绅的关系、士绅内部不同集团之间的关系。

商人研究方面。张弘《战国秦汉时期商人和商业资本研究》(齐鲁书社 2003) 探讨了战国秦汉时期商人的形成和发展, 商人与社会政治、社会经济、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少数民族和域外国家的关系等问题。姜锡东《宋代商人和商业资本》(中华书局 2002) 论述了宋代以前商人和商业资本概论, 宋代商人与小农家庭的生产活动, 宋代官私商业的经营方式, 宋代商人的市场垄断与政府的反垄断, 宋代的国有商业资本、宋代的盐商——自由盐商、钞印盐商、私盐商, 宋代的粮商, 宋代的布帛商, 政府与商人的矛盾, 宋代民间商业资本发展的重重阻力。唐力行、范金民、张翔凤、张守广著《江南儒商与江南社会》(人民出版社 2002) 论述了洞庭、徽州宁波儒商、外地商人在江南的活动。黄鉴晖《明清山西商人研究》(山西经济出版社 2002) 认为, 山西商人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始于明末, 有两种表现形式: 一种是盐商将自己部分资本交由他人经营, 盈利按银劳比例分配; 一种是富有者白银并不藏于家, 而是散于各伙计去经营。具有浓郁社会史味道的是殷俊玲的《晋商与晋中社会》(人民出版社 2006), 以清代及民初晋中社会为考察中心, 论述了人口、婚姻、家族、生意、市场、日常生活、休闲生活、晋商与晋中文化、晋商与公共领域、晋商的衰落等问题。彭南生《行会制度的近代命运》(人民出版社 2003) 以近代工商同业组织和学徒制度的转型为基线, 探讨了行会制度在近代的存在与转型及在政治、经济和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等问题。周智生《商人与近代中国西南边疆社会: 以滇西北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探讨了近代中国西南边疆各民族商人与近代滇西北这个多民族聚居区的社会变迁的关系。

其他阶层方面。沈刚《秦汉时期的客阶层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3) 将汉代的客阶层作为标志性人口, 与汉代依附化进程相联系来考察。郝春文《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主要利用敦煌文书探讨了僧尼的生活方式。尚小明《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探讨了清代学人游幕的发展变化、重要的学人幕府、游幕与学术活动。熊志勇《从边缘走向中心: 晚清社会变迁中的军人集团》(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8) 考察了军人集团从传统走向近代的历史轨迹, 探讨了晚清军人角

色凸显与社会秩序变迁的动因和结果。刘五书《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原农民负担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3)论述了中原农民的佃赋负担,田赋负担,田赋附加与税捐,农民的非赋税负担,农民负担的深层剖析。农民离村问题的研究,则有王印涣《1911—1937年冀鲁豫农民离村问题研究》(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4)一书。朱英主编《中国近代同业公会与当代行业协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内容有同业公司研究的回顾与分析、中国传统行会及其在近代的演变、近代同业公会的组织体系与治理结构、近代同业公会的经济与社会功能等。还有学者论述了近现代社会边缘人群,如邵雍《中国近代绿林史》(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4),侯杰、秦方《旧中国的下九流》(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4),曹保明《东北土匪》(西苑出版社 2004)等。

近代中国是社会剧烈转型的时期,罗志田指出:近代中国新旧两极之间的过渡地带其实相当宽广,在新旧阵营里通常也还有进一步的新旧之分,对许多人来说亦新亦旧恐怕正是常态。但“不新不旧”的人与事以及新旧各自阵营中表现不那么极端或积极的群体则成为既存近代史研究中的失语者,包括医生群体、数量极大的缠足女性、废科举后逐渐被排除出乡村教育领域的塾师群体,以及民初的“前清遗老”和四川的“五老七贤”及其追随者等,他们似更多体现了近代中国不变的一面。强调弥补近代史画面上失语的部分,或者不失为今后史家的努力方向^①。也有学者呼吁新世纪要加强研究中国近代下层社会的历史^②。

从人的个体展示的社会关系,也是认识社会结构的有效方法。张研认为特定社会运行和发展中的人,同样是社会史研究的重要视角之一。若将社会史仅仅理解为社会制度、组织结构及运作逻辑的历史,则容易以制度结构功能分析涵盖或取代对于社会行动者及其能动作用的分析,从而使整体上的社会史研究受到局限,造成缺憾。她从刘铭传的“入仕”,透视晚清基层社会与上层政权发生的深刻变化,晚清统治危机的特殊性,中国传统社会发展趋势的深层基础等,这种尝试是有新意的^③。

(四) 民间信仰与社会习尚

社会习尚与民间信仰是进入民众生活世界与观念形态的重要领域,也是实践历史人类学的好场所,在近年来的社会史研究中日益受到重视。中国社会史学会举行了“礼仪、习俗与社会秩序”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显示出强调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理论追求,突出地域社会文化研究,重视史料诠释的深度的趋向^④。

民间的宗教信仰方面,侯旭东《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探讨了佛教流行北方社会的历史背景、造像记所见民众信仰、民众佛教修持方式的特点与佛教信仰的社会影响,是研究民众思想的上乘之作。王青《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信仰与神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探讨民俗佛教及其弘教手段与阶层特点,阿弥陀信仰的产生及其流播,弥勒信仰的流播及其相关神话,观世音信仰与相关神话的源起与发展,内迁月氏族的宗教及其影响,附有论西域文化对道教的影响、魏晋南北朝的盗墓之风与人鬼恋故事的产生。余欣《神道人心——唐宋之际敦煌民生宗教社会史研究》(中华书局 2006)着眼于唐宋之际敦煌的宗教社会史,提出了“民生宗教”的概念,深入研究了敦煌的神灵谱系,并从居住和出行两个方面进一步探讨了各类宗教神灵对敦煌民众日常生活的精神影响,是一部涉及敦煌学、宗教史、社会史等方面的力作。荣新江主编《唐代宗教信仰与社会》(上

^① 罗志田《新旧之间:近代中国的多个世界及“失语”群体》,《四川大学学报》1999年6期。

^② 彭南生《关于新世纪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如何深入的思考》、林家友《历史学者需要眼睛向下透视社会》,均载《史学月刊》2004年第6期。

^③ 张研《从社会史研究视角看刘铭传的“入仕”》,《安徽史学》2006年第1期。

^④ 这次讨论会 2004年6月16-19日在武夷山举行,是为中国社会史第10届年会,由厦门大学历史系承办。参见饶伟新、刘永华、张侃《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新领域——“礼仪、习俗与社会秩序”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4期。

海辞书出版社 2003) 收录 13 篇论文, 编者的导言强调将宗教与社会联系起来考察。杨讷《元代白莲教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论述了白莲教的产生, 白莲教的历史渊源和教义, 南宋后期和元代前期的白莲教, 白莲教的堂庵和道人, 白莲教的演变, 白莲教的被禁, 普度与白莲教的复教, 白莲教与明教, 白莲教与弥勒净土信仰, 白莲教与天完红巾军, “明王出世” 与大明国号等。该书文字不多, 但很有深度。徐永志《融溶与冲突: 清末民国间边疆少数民族与基督教研究》(民族出版社 2003) 论述了古代边疆少数民族与基督宗教, 清末民国间基督宗教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 形形色色的洋教会, 传教士的布道活动, 边疆少数民族基督徒的历史考察, 基督宗教影响下的边疆少数民族社会文化生活, 以基层群众为主体的反教斗争。

民间宗教或者说秘密教门方面, 马西沙、韩秉方《中国民间宗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是我国最系统的民间宗教通史^①。濮文起《秘密教门: 中国民间秘密宗教溯源》(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0) 论述了汉末至民国时期的民间秘密宗教发展史。路遥《山东民间秘密教门》(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0) 从历史学与社会学角度对山东民间秘密教门历史与概况勾勒出一个轮廓。刘平《文化与叛乱——以清代秘密社会为视角》(商务印书馆 2002) 从文化角度研究农民叛乱, 对产生清代秘密社会的文化内涵及生存的社会环境等进行了分析。宋军《清代弘阳教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充分吸收了日本学者的有关研究成果, 结合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理论方法, 将宗教结社作为“越轨”亚文化群体, 对清代弘阳教及相关问题研究。梁景之《清代民间宗教与乡土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分别论述了清代民间宗教前史, 信仰体系的结构与内容, 群体的结构与活动, 内丹修炼与神秘体验, 民间宗教与乡土社会。附录: 福建民俗宗教信仰的实态。作者也受到了人类学的影响, 该书的研究方法是有新意的。秦宝琦、晏乐斌《地下神秘王国一贯道的兴衰》(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0) 专门探讨了一贯道。郑永华《清代秘密教门治理》(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3) 从社会控制的视角对清一代治理秘密教门的典型案例及对策演变过程进行了探讨,

包括教门与会党的秘密社会研究, 欧阳恩良《形异神同——中国秘密社会两大系统比较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4) 论述的问题有: 社会生态, 由“南会北教”说辩证, 游民与农民, 秘密社会中的女性与知识分子构成; 思想·文化, 有民间教门与秘密会党成员之心态, 忠孝与忠义, 民间教门·秘密会党与民俗文化; 政治·权力, 即专制皇权, 民间教门与秘密会党权力系统之比较。谭松林主编、秦宝琦等著《中国秘密社会》(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2) 全书七卷, 论述全面系统。雷冬文《近代广东会党: 关于其在近代广东社会变迁中的作用》(暨南大学出版社 2004) 论述了近代广东会党问题。

民间诸神信仰方面, 贾二强《唐宋民间信仰》(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2) 全书分为三篇: 上篇唐宋民间信仰的中心, 论述了自然神、人格神崇拜以及神格神性; 中篇唐宋民间信仰的基础, 探讨的问题有鬼神观、鬼之统属、由人而鬼、强鬼害人、鬼之稟性、鬼神与坟墓、鬼神之间、精怪迷信; 下篇唐宋民间信仰与宗教, 论述了道教与唐宋民间信仰、佛教的初传与民间化、佛教的报应说、唐宋民间信仰与佛经、阎罗王与泰山府君、五道五通与五显、佛教的淫祀化倾向。庙会很大程度上是民间信仰的表现形式, 两部新著值得注意。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三联书店 2002) 从中华帝国晚期时代的民间庙会这一生活空间向外延伸, 探索明清社会转型时期的民众生活与大众文化。该书内容恰如书名“狂欢与日常”, 揭示了庙会这一类游神活动的基本特征, 即它们不仅构成了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而且也集中体现了特定时节、特定场合的全民狂欢。小田《在神圣与凡俗之间——江南庙会论考》(人民出版社 2002) 导论分别论述了研究回顾、庙会界说、庙会型式与续谱、分析范式、“两个世界”理论, 接着是庙会纪程、凡俗的神圣: 仪式·信仰·神话、神圣的凡俗: 庙市、神圣的凡俗: 休闲、神圣的凡俗: 社区运作、讨论: 社会结构中的江南

^① 马西沙还著有《中国民间宗教简史》,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庙会。顾希佳《祭坛古歌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 2000）论述了吴越神歌祭坛仪式，吴越神歌作品，从吴越民间信仰心理看中国民间神灵观，神歌艺术风格论，吴越神歌手研究，神歌源流考，中国巫文化。

民俗与风尚方面。两位在德国取得博士学位的中国学者，出版了高水平的专著：简涛《立春风俗考》（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8）将民族学与历史学结合起来，重点探讨立春的文化变迁；朱青生《将军门神起源研究——论误解与成形》（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则探讨文化哲学问题，认为民间习俗是对现象和人生解释的结果。常建华《岁时节日里的中国》（中华书局 2006）力图更准确、细致、系统地反映出中国古代汉族岁时节日的基本面貌，并提出一些新说。郭振华《中国古代人生礼俗文化》（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8）、徐吉军《中国丧葬史》（江西高校出版社 1998）李如森《汉代丧葬礼俗》（沈阳出版社 2003）也各有新意。张邦炜著《宋代政治文化史论》（人民出版社 2005）“文化”部分有一组关于丧葬问题的论文，计有两宋火葬何以蔚然成风、两宋时期的义冢制度、宋代丧葬习俗举隅、辽宋西夏金时期少数民族的丧葬习俗 4 篇，另外两篇有关“土”问题研究的论北宋晚期的士风、论北宋“取士不问家世”，均是社会史关注的问题。吴存存著《明清性爱风气》（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主要依据明清小说中的描写，剖析了明清时期正统性爱观与节烈风气、纵欲主义思潮、男性同性恋风气与同性恋文学、金莲崇拜、异装癖风气，论述新颖。

（五）城市、乡村与社区

城市社会史方面，汉代城市研究方面有两部著作：周长山《汉代城市研究》（人民出版社 2001）内容包括汉代城市的发展概况、汉代城市的分布、汉代的城郭、长安与五都、汉代城市居民的基本编制、汉代城市中的市场等。张继海《汉代城市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系统探讨了汉代的聚落形态、城市与城市社会，对市与城市社会公共生活的关系、学校教育与城市社会发展关系得研究，使汉代城市的社会生活变得更为丰满，发展脉络更为清楚。程存洁《唐代城市史研究初篇》（中华书局 2002）探讨了唐代东都与边城城市，涉及城市居民、人口、生活等多方面的问题。王卫平《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史研究：以苏州为中心》（人民出版社 1999）比较全面系统地探讨了江南城市社会形态与地区市场体系结构。刘凤云著《明清城市空间的文化探析》（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1）分为城墙，坊巷与社区，官衙与民居，市廛与寺观，剧院、茶馆与会馆，私家园林六章。作者在导言中论述了中国传统城市的政治属性及其特征、中国传统城市的空间模式。徐永志《开埠通商与津冀社会变迁》（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0）综合考察了天津开埠通商对津冀社会变迁的作用及其相互关系，通过具体分析津冀政治中心的迁移、城乡通商贸易和早期工业化运动等，揭示了津冀社会在发展近代工业文明的带动下向近代社会转型的积极因素和特点。王守中、郭大松等《近代山东城市变迁史》（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1）论述了不同类型的代表性的城市，整体上把握近代山东城市的发展，并对近代山东城市发展的阶段、特点和动因作了系统的论证。何一民主编《近代中国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1840—1949 年》（科学出版社 2004）探讨了近代中国城市发展的动力、规律和兴衰的原因，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城市发展的特点和社会变迁的一般规律。陈国灿《江南农村城市化历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论述了宋元、明清和近现代（1949 年新中国成立前）三个时期江南地区的城镇发展进程以及由此引发的农村城市化现象，重点探讨了不同历史时期农村城市化的动力系统与影响因素、市镇发展状况与农村社会变革、农村城市化的地域格局与发展水平等问题。隗瀛涛主编《近代长江上游城乡关系研究》（天地出版社 2003）则是城乡关系研究的作品。

乡村社会。侯旭东《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朝廷、州县与村里》（商务印书馆 2005）收录十篇专题研究：从田园诗到历史——村落研究反思，北朝的村落，汉魏六朝父系意识的成长与“宗族”，北朝“三长制”，北朝乡里制与村民的空间认同，北朝的“市”：制度、行为与观念，北朝并州乐平郡石艾县安鹿交村的个案研究，造像记所见北朝民众的国家观念

与国家认同, 北朝朝廷视野中的“民众”, 代结论: 朝廷、州县与村里——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 该书收录两篇附录: 附录一 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所见的“乡”与“乡吏”, 附录二 评谷川道雄《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本书是作者的又一力作。谷更有《唐宋国家与乡村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考察了唐宋乡村控制问题和宋代乡村农户, 试图从乡村社会的政治结构切入, 探讨研究唐宋转型问题。乔志强主编《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研究》(人民出版社 1998) 论述全面。王先明、郭卫民主编《乡村社会文化与权力结构的变迁》(人民出版社 2002) 是山西大学历史系与《近代史研究》编辑部共同主办的“华北乡村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近代乡村社会的研究近来得到加强^①。李金铮著《借贷关系与乡村变动——民国时期华北乡村借贷之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0) 分上、下两篇, 上篇: 借贷关系的传统模式与转型, 讨论了乡村借贷基本状况、高利贷、钱会、合作社等文题; 下篇: 借贷关系的暴力革命, 论述的是中共对传统借贷关系的政策演变、传统接待关系的变化、政策性优惠农贷、合作社。深入系统的实证分析给人留下了印象。张佩国《地权分配·农家经济·村落社区——1900-1945 年的山东农村》(齐鲁书社 2000) 分为近代山东农村生态的透视、土地占有: 历史演变与制约因素、土地经营与农业增长、村落社区与国家权力的互动——以地权分配为中心 4 章, 力求在研究方法上有一定突破是本书的特色。郑起东《转型期的华北农村社会》(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4) 指出, 在 19-20 世纪之交的一个历史时期中, 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国民政府都曾进行了一场旨在遏制绅权以重建县以下基层政权的国家政权建设, 但结果都反而是扩张了绅权, 削弱了政权, 最终导致基层国家政权建设的失败。

村落社区。王铭铭《溪村家族——社区史、仪式与地方政治》(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4) 是同作者《社区的历程》(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7) 的增补版, 强调以经验性的地方史料为基础来自下而上地重新审视地方史的具体过程, 除了对原书修改外, 增加了两篇文章, 即《现代场景中的灵验“遗产”——围绕一个村神及其仪式的考察》与《地方政治与传统的再创造——溪村祠堂仪式活动的考察》。郑振满、张侃、刘永华等撰《培田》(三联书店 2005) 探讨福建省西部山区的一个客家古村落培田, 试图利用图文形式建构该地社区的社会史。全书分为河源十三坊, 畲族与客家, 家族的繁衍, 聚落的年轮, 生计的变迁, 崇文与尚武, 祖先与神灵, 风水的营造, 理想的家园。王振忠《水岚村纪事 1949》(三联书店 2005) 婺源山村少年詹庆良的日记, 论述了一九四九年前后僻远山乡的社会生活、特定历史情境中民众的内心体验、主人的人生梦想等等。

综合性的研究成果, 有李长莉、左玉河主编《近代中国的城市与乡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选取了 2005 年 8 月青岛“首届中国近代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部分论文, 对中国近代城市的社会空间、城市经济、市民生活, 对中国近代乡村的社会结构、乡村经济与乡村建设、乡村生活、地域社会与公共事业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六) 生态环境、灾荒、救济与慈善事业

灾荒与社会是老课题, 但是有新探索。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编《自然灾害与中国社会历史结构》(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 全书不仅从宏观的角度对剖析了自然灾害与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 而且以中国历史上所发生的大量自然灾害个案为切入点, 深入细致地探讨了灾害的过程与规律、灾害与人口的关系、灾害中官僚系统与地域社会的作用、水灾与地域社会、灾害与社会风俗等问题。王振忠《近 600 年来自然灾害与福州社会》(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6) 选取自然灾害和社会关系为切入点, 探讨福州社会。王振忠研究徽州社会史, 也关注瘟疫、灾荒与民俗^②。夏明方著《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中

^① 中山大学历史系举办了“近代中国乡村威权国际学术讨论会”, 参见翁有为、徐有威的会议综述, 载《史学月刊》2004 年第 11 期。《史学月刊》2004 年第 12 期还发表了“近代中国乡村史笔谈”。

^② 王振忠《徽州文书所见种痘及相关习俗》, 《民俗研究》2001 年第 1 期; 王振忠《清代徽州民间的灾害、信仰及相关习俗》, 《清史研究》2001 年第 2 期。

华书局 2000) 分别论述了民国时期的自然灾害及其环境后果, 自然灾害与人口变迁, 自然灾害与乡村经济, 自然灾害与社会冲突, 灾害源与民国时期的社会脆弱性等问题。

社会救济与慈善事业方面。王卫平、黄鸿山《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保障与慈善事业——以明清时期为重点的考察》(群言出版社 2004) 上编传统社会保障, 论述了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保障制度的形成、发展演变、元代社会保障事业、明朝与清朝的社会保障政策、明清时期的残疾人社会保障与宗族社会保障、传统仓储制度社会保障功能的近代发展; 下编民间慈善事业, 论述了中国古代慈善事业的思想基础、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民间慈善事业、清代普济堂的经营实态、清代江南地区的育婴事业与育婴事业圈、清代苏州的慈善事业、清代江南市镇的慈善事业、中国传统慈善事业的近代转型等问题。

断代研究方面, 张文研究宋代社会救济与民间慈善活动, 著有《宋朝社会救济研究》、《宋朝民间慈善活动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2005), 前书系统整理了宋朝社会救济包括赈灾救荒、济贫恤穷、优抚救济等方面的问题, 颇多新的发现; 后书阐述民间慈善的概念及其相关问题, 分析宋朝民间慈善的基本形式, 研究宋朝民间慈善的基本结构, 论述宋朝民间慈善的主体, 从意义、特点、功能等方面对宋朝民间慈善活动进行总结。游子安研究明清慈善事业, 著有《劝化金箴——清代善书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9)、《善与人同: 明清以来的慈善与教化》(中华书局 2005) 两书, 前者探讨善书, 后者论述善人善事, 都是资料扎实的著作。民国则有蔡勤禹的研究, 他的《国家社会与弱势群体——民国时期的社会救济》(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3) 论述了传统社会的社会救济, 现代社会救济制度的确立, 国民政府的社会救济, 民间社会的互助共济, 民国社会救济的反思。蔡勤禹著《民间组织与灾荒救治——民国华洋义赈会研究》(商务印书馆 2005) 论述了华洋义赈会兴起的经济社会环境, 华洋义赈会演变与合法性取得, 华洋义赈会治理结构, 经费筹集与使用, 防救结合、以防为主, 合作实验与推广, 华洋义赈会与民国政府。池子华《红十字与近代中国》(安徽人民出版社 2004) 探讨了发轫于俄日之战延续到建国前的中国红十字会。

研究生态环境与社会的关系是近年来的新方向, 为人重视^①。冯贤亮著《明清江南地区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从新的角度对江南地区社会的长期稳定的内在因素所进行的全面考察, 主要从行政管理、地方防护、水利调控、灾害应变机制、宗教和民间信仰意识形态等方面, 分析中央、地方政府和民间三大层面, 如何对自然和社会两种环境变化的应对能力, 即所谓社会控制, 使社会处于长期稳定的秩序和发展势态。许怀林著《鄱阳湖流域生态环境的历史考察》(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4) 分为清代以前江西的经济开发与生态环境, 近代以来江西的水旱灾害与生态变动, 江西工业化进程中水资源状况的变化, 治理水土流失、发展生态经济的实践经验, 江西经济开发与生态环境的专题分析 5 篇。钞晓鸿著《生态环境与明清社会经济》(黄山书社 2004) 上编: 生态环境与明清社会构成, 下编: 明清以来的商业、人口与农村经济。该书较多探讨了陕西关中地区的生态与社会。赵珍《清代西北生态变迁研究》(人民出版社 2005) 着重论证在生态环境恶化过程中, 人类的过量介入引发的恶性循环。王建革《农牧生态与传统蒙古社会》(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6) 运用生态人类学和历史学方法, 主要根据满铁资料对近代蒙古草原的生态与社会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论述了草原生态和游牧生态的内容, 畜群与蒙古社会的关系。蒙古游牧社会在汉农业渗透后所发生的重大变化。随着生态环境意识的强化, 人们越来越重视这一领域的研究, 对于社会史而言, 生态环境的研究应有人文关怀, 应反映出人的活动以及社会变迁, 应

^① 《史学月刊》2004 年第 3 期发表“环境史研究笔谈”, 同年第 6 期还发表了任宏伟的《近十年来生态环境变迁史研究综述》。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等单位于 2005 年 8 月 17—19 日举办“中国历史上环境与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 讨论了中国环境史研究的理论和意义, 全球视野下的环境史研究, 环境变迁与经济发展, 生态环境诸要素的历史变化, 生态环境与社会构造和运行空间, 灾害、疾疫与生态环境, 生态环境与社会生活和文化等问题。请参见王利华所写会议述评, 载《天津社会科学》2006 年第 1 期。

是社会历史整体的一部分，有关论文值得借鉴^①。

（七） 人口问题

通论方面有姜涛《人口与历史》（人民出版社 1998）从人口探讨了多种社会结构。葛剑雄主编《中国人口史》（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2）分为先秦至南北朝时期、隋唐五代时期、宋辽金元时期、明时期、清时期、1910-1953 年六卷，分别由葛剑雄、冻国栋、吴松弟、曹树基、侯杨方撰写。池子华《中国流民史·近代卷》（安徽人民出版社 2001）探讨了中国近代流民的发生机制、流向、职业等，对直隶、淮北灾荒、社会变迁与流民重点论述，并就流民调控模式、功能、成效及其时代价值加以论述。曹树基《大饥荒：1959-1961 年的中国人口》（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 2005）重建 1959-1961 年中国各地非正常死亡人口数。赵全鹏《清代养老制度》（西安出版社 2003）对清代养老问题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

区域人口史研究。山西历来是重要的移民输出地，安介生《山西移民史》（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9）系统论述了山西移民史。闫天灵《汉族移民与近代内蒙古社会变迁研究》（民族出版社 2004）以汉族移民及汉族移民社会的成长为中心，全面考察了移民以及移民社会问题。吴建华《明清江南人口社会史研究》（群言出版社 2005）探讨了明清江南人口增长的低速度与人口绝对数量的增加，宗谱人口增长与世代间隔，人口密集及其对社会的压力问题，人口与土地、粮食、物价、住房关系的变化，人口职业结构与职业人口构成，市镇密度和城市人口结构变动，社会繁荣人口流移，人口的文化教育与人口文化素质，人口社会管理，人口社会系统。书中对近年来引起讨论的江南人口是否具有压力的问题有所讨论，这是应当注意的。方志远《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人民出版社 2001）与温锐、游海华《劳动力的流动与农村社会经济变迁——20 世纪赣闽粤三边地区实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是两部研究人口流动与经济发展的著作。

美国华裔学者李中清等与中国学者合作研究，探讨人口行为以及人口与社会的关系，定宜庄、郭松义、李中清、康文林著《辽东移民中的旗人社会——历史文献、人口统计与田野调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4）第一部分从户口册入手：盛京内务府三佐领属下的人丁；第二部分家族组织与八旗制度之间：来源与迁徙；第三部分“在旗”与“随旗”：民族认同与人口行为。该书绪论阐述了清代不同移民地区比较、使用资料与方法论等问题，附录“盖州与辽北调查记”记载田野调查的甘苦与经验值得借鉴。李中清、郭松义、定宜庄编论文集《婚姻家庭与人口行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立意新，收录中外学者论文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准。

三、社会史特点：机遇与挑战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近十年，中国社会史研究发生了一些变化，更加注重理论思维与问题意识，研究成果具有如下特点：

首先是研究者能够从多元学科视野看问题。开展跨学科研究，加强社会史与地理学、人类学、考古学、宗教学、社会学、民俗学、文学艺术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对话，已是社会史研究者的共识。近年来影响社会史最大的大概要算人类学了，甚至可以说社会史发生了人类学的转向。社会史的兴起与历史人类学有不解之缘，一些学者努力实践历史人类学。换位思考、从习俗进入社会、重视民众观念、文献研究结合田野调查进入了社会史研究，历史人类学应运而生。华南社会史研究者执历史人类学先鞭，他们举办历史人类学研讨班，培养历史人类

^① 如郑振满《仙游沿海的生态环境与人口变迁》，庄英章、潘英海合编《台湾与福建社会文化研究论文集》，台北：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 1994；刘志伟《边缘的中心——“沙田—民田”格局下的沙湾社区》，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第一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2。

学人才，效果明显。赵世瑜采用新方法研究华北，别具一格。如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传说在明清以来的华北各地流传甚广，并大量载之家谱、墓志和地方志。研究者多认为它反映了明洪武、永乐时期大移民的史实，并将洪洞视为政府大规模强制移民的中转站。赵世瑜指出：有关洪洞大槐树迁民的传说故事中有两条族群认同的轨迹。一条轨迹是宋代以后北方族群混居的历史为背景的，这种情况又因元代汉族族群的受压抑而得到强化。另一条轨迹则是在清末民国初开始出现的，地方知识精英利用自己手中的文化权力对传统的资源加以改造，希望把大槐树从一个老家的或中原汉族的象征，改造成为一个国族的象征^①。一些历史人类学著作出现，如王铭铭《逝去的繁荣：一座老城的历史人类学考察》（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9）开拓历史、文化、权力三个概念之间的关系空间，用历史人类学方法探讨泉州城市变迁史。张佩国《近代江南乡村地权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分为方法论的探讨，村界：有形与无形之间，村籍：一种地方性制度，农家生计，分家析产，宗祧继承与家产纠纷，族产与家族伦理，“一田二主”发生的社会空间等。作者所说的历史人类学研究，是指中国乡村史的乡土化书写。张思《近代华北村落共同体的变迁——农耕结合习惯的历史人类学考察》（商务印书馆 2005）从华北农耕结合习惯入手，回应日本学者提出的华北村落共同体问题。陈进国《信仰、仪式与乡土社会：风水的历史人类学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利用结合丰富的文献资料与田野调查，将生活史，宗教史，家族史，思想史揉合在一起，论述了福建民俗化、仪式化的信仰与社会生活。历史人类学研究民俗习惯的历史变迁，以揭示人的行为反映的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开展历史人类学研究的意义，不是发现一个研究领域，而是强调一种研究方法。历史人类学研究体现了年鉴学派时段和整体史学的追求，这种研究具有微观史学的特点，仪式、社区与文化认同的研究占有重要的地位。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决定了必须扩大史料来源，注意民间资料，特别是利用非文本的资料。

值得注意的还有人类学界的回访研究。在社会/文化人类学界，回访或跟踪研究是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庄孔韶等著《时空穿行：中国乡村人类学世纪回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集中了人类学界庄孔韶、阮云星、潘寿永、兰林友、段伟菊、张华志、周大鸣、孙庆忠、覃德清（以书中文章顺序为序）九位学者的专题论述。对 20 世纪九个人类学先行者的田野调查点进行回访，这些人类学的先行者及其著作是：林耀华《金翼》（1944）、《义序宗族的研究》（1935），杨懋春《一个中国的村庄：山东台头》（1945），“满铁”调查报告（后夏寨，1952—1981），许烺光《祖荫下》（1948）、葛学溥《华南乡村的生活》（1925），杨庆堃《向共产主义转化前夕的中国村落》（1951），波特夫妇《中国农民：革命的人类学》（1990）。这些人类学家提出的理论至今闪耀着生命的火花，他们的著作已经成为经典。对于社会史的社区史、乡村社会史研究来说，人类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而回访与跟踪研究本身揭示了地方社会的变迁，也构成了地方社会史^②。

多种具有跨学科性质的研究引人瞩目。融合疾病、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医疗社会史属于新的学术领域，虽然起步较晚研究者较少，但是研究起点很高，学术成果引人注目^③。曹树基、李玉尚开展了鼠疫与社会的研究，注意鼠疫对于人口死亡的影响。曹树基指出北方生态环境变化引起的鼠疫流行，认为明末鼠疫流行对明朝灭亡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探讨了鼠疫的流行模式以及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对应，通过国家公共卫生问题的考察，丰富了社会史的内容^④。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① 赵世瑜《祖先记忆、家园象征与族群历史》，《历史研究》2006年第1期。

^② 这方面的代表作是庄孔韶《银翅：中国的地方社会与文化变迁（1920—1990）》，北京：三联书店 1999 年版。

^③ 参见余新忠《中国疾病、医疗史探索的过去、现实与可能》，《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

^④ 曹树基《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1580—1644年）》，《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光绪年间云南鼠疫的流行模式——以市镇和村庄为基础的研究》，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所、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主编《历史人类学学刊》第一辑，香港科技大学出版 2003；《1894 年鼠疫大流行中的广州、香港和上海》，《上

论述了清代江南瘟疫的生态社会背景、疫情、对瘟疫的认识、瘟疫成因探析、与社会的互动，为人们展示了清代江南社会的瘟疫与社会的历史。本书与李玉尚博士论文《环境与人：江南传染病史研究（1820-1953）》先后获得了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赖文、李永宸《岭南瘟疫史》（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4）是对瘟疫在岭南实际发生和流行情况（即“疫情”）以及与某次瘟疫的发生、流行、危害、防治等有关之史实的回顾和研究。着重介绍 1911 年以前岭南瘟疫的时空分布以及相关的自然、社会背景情况，尤其是晚清时期霍乱、鼠疫传入岭南后，在岭南各地持续流行和爆发流行的情况以及各界应对新瘟疫袭击的举措。张大庆《中国近代疾病社会史（1912-1937）》（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6）从疾病谱的构成与特性、中国近代疾病观念的变迁、现代西医学建制、医疗卫生体系的建构、卫生知识的普及和传播、城市与乡村的医疗卫生实践，以及疾病模式转换中的医患关系等不同层面，全面论述了民国早期的疾病社会史。杨念群著《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5-198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揭示了晚清以来的中国人从“常态”变成“病态”，在近代被当做“病人”被观察、改造和治疗的历史。认为“东亚病夫”的称谓既是中国人被欺凌的隐喻，也是自身产生民族主义式社会变革的动力。“治病”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医疗过程，也是政治和社会制度变革聚焦的对象。这种从身体政治看社会变迁的研究，堪称“新社会史”的典范之作。上述学者中，张大庆、赖文、李永宸是医学界的医史研究者，而其他学者则是历史学者，医学与历史学研究者共同为医疗社会史的繁荣作出贡献。医疗社会的发展势头很好，北京大学医学史研究中心于 2003 年 11 月 24 日举办了“首届中国医学社会史学术研讨会”，医学界主动与历史学对话^①。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则于 2006 年 8 月 9-12 日召开了“社会文化视野下的中国疾病医疗史”国际研讨会，进一步推动医疗社会史的研究。

探讨思想与社会、法制与社会这类从某一侧面强化整体历史研究的题目在增加。思想史与社会史的结合，出现了一些很有影响的著作。杨念群所著《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三联书店 1997），用“话语分析”方法描述儒学传统在区域空间中的扩散过程，及其对近代知识群体运动的影响。葛兆光《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8）不仅关心古代中国精英与经典思想的发展，而且分析这些思想得以形成与确立的知识来源和终极依据，描述了作为这些思想的土壤的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历史。使我们看到思想史还有另外的写法。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从明清之际士大夫的“话题”入手，进行“人与思想”的连接，以揭示士人的心态。上述三种书具共同点，就是运用“话语分析”的方法，重视知识与社会的关系。注重思想与民俗的还有李零《中国方术考》以及《续考》（东方出版社 2000），主要利用考古发现讨论战国秦汉时期流行的“术数方技”，其间涉及占卜、炼丹、行气、导引、房中、“巫”、方士、宗教与信仰等问题。黄正建《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学苑出版社 2001）研究了敦煌占卜文书与其它地区使用的占卜典籍的异同，从而说明当时社会占卜的一般特点和向宋代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变化，以及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特点及变化的关系。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致力于思想与社会的互动研究，首批重大项目“政治理念与中国社会”成果，以中国社会史研究丛书第二辑推出 12 种书^②。

海交通大学学报》2005 年第 4 期；《国家与地方的公共卫生——以 1918 年山西肺鼠疫流行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2006 年第 1 期。

^① 参见《首届中国医学社会史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中华医史杂志》2004 年第 1 期。

^② 该辑丛书由刘泽华教授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年出版，计有刘泽华、张荣明等编著的《公私观念与中国社会》，张分田《中国帝王观念—社会普遍意识中的“尊君—罪君”文化范式》，萧延中《“天命”与“德性”——中国政治思想中的“正当性”问题》，李冬君《孔子圣化与儒者革命》，李宪堂《先秦儒家的专制主义精神——对话新儒家》，刘丰《先秦礼学思想与社会的整合》，季乃礼《三纲六纪与社会整合——由〈白虎通〉看汉代社会人伦关系》，马小虎《魏晋以前个体“自我”的演变》，张师伟《民变的极限——黄宗羲政治思想新论》，邓丽兰《域外观念与本土政制变迁——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知识界的政制设计与参与》，陈永森《告别臣民的尝试——清末民初的公民意识与公民行为》，张晓唯《蔡元培与胡适（1917—1937）——中国文化人与自由主义》。

法制社会史的探讨发表了很多论文,专著则集中在清代。陈亚平《清代法律视野中的商人社会角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研究清代法律与社会变迁问题,探讨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下商业化发展和商人社会角色的变迁过程。赵晓华《晚清讼狱制度的社会考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从讼狱制度看社会是其特色。张仁善《礼·法·社会——清代法律转型与社会变迁》(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1)较为系统地探讨了清代礼法在清前期、中期和末期与社会生活、社会结构、社会心态等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同时期礼法的社会功能,梳理出清代礼法由合一到分离的线索,分析了礼法的演变对传统中国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的影响。张仁善还著有《司法腐败与社会失控(1928-194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一书。孙丽娟《清代商业社会的规则与秩序:从碑刻资料解读清代中国商事习惯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根据清代工商业碑刻资料的记载,认为清代商业社会各行各业都制定有一些规则和制度,与欧洲中世纪商人习惯法的内容非常相似,这些规则与制定法中有关商事方面的规范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商事法的体系。海外学者法制社会史的著作被介绍到中国^①。

地理学与社会史的关系越来越密切^②,近十年来新兴发展起来的历史文化地理研究,往往包含着社会内容。卢云《汉晋文化地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1)深入研究了汉晋时期精神文化领域具有代表性的学术文化区域及其变迁、滨海宗教文化带与汉晋三次宗教浪潮、婚姻形态的地域分布、俗乐区域与雅乐中心等问题。王子今《秦汉区域文化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8)讨论了秦汉时期 12 个文化区的人文社会面貌和民俗文化构成,秦汉文化共同的形成及其区域文化传统基因(如乡土意识、文化节奏、儒风流布、人口流动等)。程民生《宋代地域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7)也是一部断代文化地理研究的专著。张伟然《湖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5)、《湖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0)探讨文化与环境之间的感应、人类行为的环境效应,具有社会文化史、历史人类学的意蕴。蓝勇的《西南历史文化地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研究了大文化因素中的人种、饮食、服饰、居室、交通等空间变化。张晓虹《文化区域的分异与整合——陕西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4)论述了民俗的区域差异、民间信仰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林拓《文化的地理过程分析》(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4)从学术形态研究地域层级与文化中心,从信仰形态讨论地域分化与文化周期,涉及不同时期文化形态的地域性特征,属于文化学、地理学、历史学结合的著作。

其次,社会史研究多采取地域社会史的研究视角。现在众多的社会史研究者树立了从地域社会入手的研究理念,认为地域是认识中国历史的有效途径。地域社会的研究中,地域史的层次性问题已经引起注意,2002 年上海举行的第九届社会史年会主题是“国家、地方、民众的互动与社会变迁”,就表现出这种思路,华南学者从边缘看中国的“化内与化外”以及国家认同的研究思路影响颇大。区域比较研究也被强调,行龙、杨念群主编《区域社会史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是 2004 年 8 月 15-18 日在山西大学举行的“区域社会史比较研究”中青年学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内容分为“水利社会”辨析、区域差异与时代变革、宗法宗族与基层社会构造、区域社会史研究方法新论四大部分,展示了一些区域史模式之间的对话与跨学科的研究视野。

华北地区,除了前面提到的研究华北的重要著作之外,苑书义等《艰难的转轨历程——近代华北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人民出版社 1997)主要考察了清末民初华北向近代化的转向。行龙主编《近代山西社会研究——走向田野与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是有关山西社会的专题论文汇编,作者利用田野调查和地方文献,对近代以来山西人口、水资源

^① 如黄宗智《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3 年版;白凯《中国的妇女与财产:960-1949 年》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3 年版。

^② 参见华林甫《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学》(《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01 年第 3 期)对“历史社会文化地理研究”的介绍。

及水案、灾荒、集市、民教冲突、祁太秧歌等专题进行了研究,反映了近代山西的社会风貌和历史变迁。江沛、王先明主编《近代华北区域社会史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5)分名家笔谈、天津史研究、经济与社会考察、教育谈片、民间结社探析、比较研究、田野心得等栏目,收录了 24 篇论文,并附录“1950 年以来华北区域社会史研究论著索引”。王云《明清山东运河区域社会变迁》(人民出版社 2006)分为三篇:运河的贯通和鲁西区位优势的形成,商业的繁荣与产业结构的新变化,南北文化交流与社会风俗变迁。探讨了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社会变迁的历史动因、社会变迁的起伏过程和社会变迁的历史趋势及特点。一些推动华北区域社会史的讨论会接连举行^①,华北区域社会史迅速发展。

江南地区,李伯重《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1250—1850)》(三联书店 2003)不乏社会史方面的重要论文,涉及宋末至明初江南的人口变化、农民经营方式的变化,清代前中期江南的人口行为、人口增长、人口控制、控制人口增长的动机,对“最低生存水准”与“人口压力”质疑,宋元明清时期江浙地区的节育方法及其运用与传播等,提出了众多的新看法。熊月之、熊秉真主编《明清以来江南社会与文化论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4)收录了大陆与台湾学者研究经济变迁、区域互动、商业网络、绅商阶层、文化生产、情欲与性别、消费与文化等方面的论文。唐力行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6—19 世纪苏州与徽州历史发展差异的比较研究”项目,认为明清以来随着徽商向江南经济中心苏州的移徙,两地经济、文化互动日趋频繁,财力雄厚的徽商将巨额的商业资本汇聚到苏州,大大增强了苏州的活力。徽商的商业利润输回徽州,却加固着徽州宗族社会的旧秩序,苏州与徽州的互动,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②。近年来苏州大学的江南社会史研究引人注目,前引王卫平、吴建华、徐茂明等人都出版了研究江南社会的专著,王卫平还著有《吴文化与江南社会研究》(群言出版社 2005)收录作者论述吴国的崛起与盛衰,吴文化流变与特征,社会风气与社会问题,城市与市场,荒政与社会救济方面的论文。范金民等主编《江南社会经济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2006)分为六朝隋唐卷(胡阿祥主编)、宋元卷(高荣盛主编)和明清卷(范金民主编)3 卷,采取论文集的形式,对自六朝至清代将近 900 年间的江南社会经济做探讨,内容涉及农业、人口、土地制度、赋税、作物、基层组织等。其中一些社会史方面的论文,如“明清卷”宋立中《婚嫁论财与婚姻礼俗变迁——以明中叶至清代的江南为中心》、谢娟《明代医人与社会——以江南世医为中心的医疗社会史研究》立意较新。此外,还有陈江《明代中后期的江南社会与社会生活》(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6)一书。

徽学研究近年来得到加强。王振忠《徽州社会文化——新发现的 16—20 世纪民间档案文书研究》(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主要探讨了村落、宗族与社会变迁,乡土习俗及民间文化,启蒙读物与商业书类,“徽侨”与长江中下游区域社会。力求通过全面展示新史料来呈现徽州社会的面貌。安徽大学出版社于 2004 年推出“徽学研究学术丛书”首批共 5 种著作,分别是叶显恩著《徽州与粤海论稿》、韩秀桃著《明清徽州的民间纠纷及其解决》、朱万曙主编《论徽学》以及朱万曙、卞利共同主编的《戏曲·民俗·徽文化论集》、卞利著《明清徽州社会研究》。其中卞利《明清徽州社会研究》主要内容为明清徽州的社会变迁、社会结构、徽商与社会、民俗与社会、法制与社会、社会问题、徽州文书与文献资料七个专题。安徽人民出版社 2005 年出版《徽州文化全书》,包括 20 卷,计有:《徽州土地关系》、《徽商》、《徽州宗族社会》、《徽州教育》、《新安医学》、《徽州戏曲》、《徽州文书档案》、《徽州村落》、《徽州民俗》等。其中唐力行的《徽州宗族社会》论述了徽州宗族社会的形成与分布、结构、文化教育、社会生活实态、与徽商的关系、社会控制、迁徙与定居、社会变迁等问题。此外,

^① 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2003 年 11 月 28 日—12 月 1 日举办了“明清以来华北社会经济研究”学术研讨会,参见乔南所写会议综述,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 年第 2 期。

^② 唐力行《明清以来苏州、徽州的区域互动与江南社会的变迁》,《史林》2004 年第 2 期;同期还发表有吴建华《明清苏州、徽州进士的文化素质与文化互动》,徐茂明《清代徽苏两地的家族迁徙与文化互动——以苏州大阜潘氏为例》,李明《明清苏州、扬州、徽州三地风俗的互动互融——兼谈“苏意”、“扬气”、“徽派”等区域比较论文。

周绍泉、赵华富主编《'98 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0) 不乏社会史方面的作品, 值得参考。

长江中游的两湖地区近年来研究成果突出。陈锋主编的主编的“15 至 20 世纪长江流域经济·社会·文化变迁”书系, 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包括陈锋主编《明清以来长江流域社会发展史论》, 冯天瑜、陈锋《武汉现代化进程研究》, 任放《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经济研究》, 杨国安《明清两湖基层组织与乡村社会》、周荣《明清社会保障制度与两湖基层社会》。其中任放《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经济研究》(2003) 主要论述了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经济所依托的自然及人文环境, 市镇网络, 墟场及集期, 专业市镇, 市镇与仓储, 市镇的管理机制, 市镇的功能, 市镇经济的近代转型。杨国安《明清两湖地区基层组织与乡村社会研究》(2004) 论述明清两湖地区基层组织中的设置与演变, 基层组织与户籍管理、赋役征收、社会控制, 以及宗族、士绅与两湖乡村社会。作者不但注意搜罗明清两代的文献载籍, 还走向田野进行调查, 体验乡土生活, 使得该书的论述更加充实。周荣《明清社会保障制度与两湖基层社会》(2006) 探讨明清时期两湖地区社会保障生活中长期起作用的机制、机制演变过程和运作实态, 揭示明清社会保障体系的全貌和两湖社会保障的区域特色。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还于 2005 年 11 月 19—20 日组织了“14 世纪以来长江中游地区的环境、经济与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 推动对长江中游地区的研究。刘泱泱《近代湖南社会变迁》(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8) 论述了湖南 1840—1949 年间建置沿革、人口与民族、外来冲击力、商品经济发展、近代工业的兴起、新的阶级阶层与社会势力、家庭与宗教组织的变革、日常生活演变、风俗礼仪嬗变、传统宗教的衰落等方面的问题。李金铮《民国乡村借贷关系研究——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中心》(人民出版社 2003) 论述了长江中下游地区民国乡村借贷关系在农村经济活动中的作用、特点与地位。

岭南有叶显恩《珠江三角洲社会经济史研究》(台湾稻乡出版社 2001), 全书共收入了作者自 1980 年代以来探讨珠江三角洲社会经济史的论文, 涉及市场发展与转型、海外贸易、商业活动、人口、宗族与族田、华工、航运、蠹民等内容。刘平《被遗忘的战争——咸丰同治年间广东土客大械斗研究》(商务印书馆 2003) 论述了近代广东斗祸的远因与近因, 从斗祸的时间跨度与空间分布、主战场研究了斗祸的基本情形, 探讨清政府的对策与斗祸的基本平息。程美宝《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 晚清以来“广东文化”观的形成》(三联书店 2006) 讨论了广东“地域文化”在晚清到民国年的形成过程, 着重从历史叙述、种族血统、学术传承、方言写作、地方民俗等方面加以论述, 指出这些范畴的内涵是在特定历史时空中的政治对话过程层积而成的。并认为近代“地域文化”话语的建立, 也是近代中国国家观念从“天下”转移到“国家”的过程。

区域研究中, 社会经济史研究有传统, 学者呼吁加强这一领域研究的同时也发出了一些告诫^①, 而对地方历史文化的区域研究, 有学者提出了批评^②。社会史的地域研究应当借鉴以往区域经济、区域文化研究的经验教训。

^① 《史学月刊》2004 年第 8 期发表了一组“明清时期中国区域社会变迁笔谈”, 包括赵世瑜《作为方法论的区域社会史——兼及 12 世纪以来的华北社会史研究》、陈春声《历史的内在脉络与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许檀《区域经济与商品流通——明清时期中国经济发展轨迹探讨》、范金民《江南市镇史研究的走向》, 其中赵世瑜是从社会史而非社会经济史角度论述的。陈春声指出: “在明清社会经济史区域研究中, 学术创造和思想发明明显薄弱, 其重要的原因之一, 就是学术从业者追寻历史内在脉络的学术自觉的严重阙失。”

^② 陈支平《区域研究的两难抉择》(《中国史研究》2005 增刊) 指出: 近十余年来文化史和区域史的研究, 存在着一个很明显的缺陷, 即是大多数的论者, 宁愿把中国的文化以及区域的文化讲得好一些, 而不大愿意把其中的不足之处, 乃至某些糟粕的东西如实地反映出来。未能把一区域的社会文化现象与其他区域的社会文化现象做一个客观的比较分析, 有关的区域史研究文献资料的局限性也是导致这种研究偏颇的重要因素之一, 学者在归纳区域社会文化特征时, 往往把中华文化共性的东西当作区域的特征来论述, 而把真正属于区域特性的东西迷失了。呼吁较为客观地探索区域历史文化的优点、缺点以及它与中国整体历史文化、与其他不同区域历史文化的关系。

再次，社会史与文化史的融合已成趋势。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社会史研究注重日常生活，挖掘社会生活的文化意义，立足地域考察历史，构成新社会史的特征。虽然新时期社会史重在研究社会生活。实际上对于民众日常生活具有突破性的深入研究并不多^①。社会生活研究强调接近民众日常生活的实态，民众日常生活研究的突破，需要结合民众意识、信仰探讨，引入心态史与历史人类学理念。彭卫《汉代社会风尚研究》（三秦出版社 1998）近似于法国年鉴学派的心态史学，所收汉代人精神世界的二重结构、汉代自杀现象研究、汉代复仇风尚考察、汉代体貌观念及其政治文化意义、汉代行为语言考察、汉代交际语言类型及其文化含义、汉代“大丈夫”语汇考七篇论文，很有新意。王利华《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对华北地区生存环境、人口承载能力、饮食生活的内容和质量的考察，对中古时代的中国人的饮食以及历史变化等问题，作了深入探讨。

近年来不断有人呼吁加强生活史的研究^②。《史林》2002年第4期发表“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笔谈”，熊月之《稀世富矿：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研究的价值》认为“随着全球城市化程度的提高，作为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信息中心于一体的城市，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突出和重要，城市史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其中，城市社会生活史已是国际史学界备受重视的研究重点之一。”李长莉《上海社会生活史的典型意义》强调社会生活就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钱杭《“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的三个关键词》认为“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可以分为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历史（演变或变迁）三个关键词。在城市社会生活研究方面，李长莉《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生活与伦理的近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2）论述了晚清上海西器洋货流行与近代工商观念，尊卑失序之风与社会平等观念，享乐崇奢之风与消闲消费观念的商业化，妇女走上社会之风与男女平等观念，台基、姘居之风与自主择偶观念。刘志琴研究员以“观念源于生活”为题作序。认为该书有助于认识中国近代的社会变迁与近代沿海大城市的民众生活，将生活与伦理连结在一起，体现出社会文化史的特点。王笛《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从下层民众的日常生活叙述下层民众与地方精英、国家权力这三者之间的冲突、控制，将普通的街头事件与公共决策联系起来，以成都的社会和文化反思城市现代化，强调近代中国城市大众文化和下层民众的研究^③。周俊旗主编《民国天津社会生活史》（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4）论述了天津在民国时期高速发展为北方经济中心都市的过程，衣、食、住、行、就业、交往、消闲、时尚的情况，行为方式，天津的文化核心与城市特性。“民国百姓生活文化丛书”^④的出版，也反映了日常生活融合了社会文化。

社会生活本身也是一种观念形态，也映照着一定的思想。地方社会同时也是地方文化。前进程美宝《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晚清以来“广东文化”观的形成》，明显地反映了社会史与文化史的融合，这种研究也富有新意。

^① 黄正建《韩愈日常生活研究—唐贞元长庆间文人型官员日常生活研究之一》（《唐研究》第四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指出：“近年来随着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的勃兴，对唐代历史中‘社会生活’领域的研究也兴盛起来。但是目前这种研究往往比较笼统，不分时代前后、不分阶层高下、不作定量分析，所以常常使人感觉缺乏具体性。鉴于此，本文拟就唐代某一时期某一阶层中的某个个人的日常生活作些探讨，期望在探讨许多不同的个案之后，将这一时期的日常生活状况具体化，或者能为唐代社会生活史研究的深化提供一点参考。”事实上，黄先生的说法也大致符合其他断代的“社会生活”研究状况。因此，深入的活的日常生活研究仍然是人们所期待的。

^② 如卢汉超《历史研究中的民众生活史研究问题》，张仲礼等主编《中国近代城市发展与社会经济》，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9 年版；朱和双、李金莲《探寻逝去的生活方式——历史人类学散论》，《广西民族研究》2003 年第 4 期；刘新成《日常生活史：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光明日报》2006 年 2 月 24 日。

^③ 参见王笛《近代中国大众文化研究叙事方法的思考》，《史学月刊》2006 年第 5 期。

^④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5 年出版，计李少兵《衣食住行》、左玉河《婚丧嫁娶》、郭艳梅等《节日节庆》3 册。

综上所述,近十年来中国社会史研究在理论方面活跃,思考着一些历史学的根本性问题,社会史的具体研究也有探索精神,并取得了可观的成就;社会史学者能够从多元学科视野看问题,立足地域社会史研究,融合社会史与文化史研究,展现出社会史研究的魅力与前途。这些成就的取得既是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所致,也同国家对于社会科学的支持相关。目前高校的社会史研究,除了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之外,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华中师大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也将社会史作为重点研究方向,这些都是世纪之交被教育部认定的国家级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上海师大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等省级重点研究机构也是社会史研究的重镇。社科院系统的社会史研究机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社会史研究室、近代史所文化史研究室、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社会史研究室等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还在文化史研究室、经济史研究室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中心”。还有一些单位也把社会史作为研究重点。这些科研实体获得不少研究项目,得到了较为充足的科研资金,稳定了研究队伍。而且社会史学界也拥有了专门刊物《中国社会历史评论》(1999年创刊)、《历史人类学刊》(2003年创刊),这两个有特色的刊物引起学术界广泛的关注。现在的学术条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中国社会史研究应当有更长足的进步。

中国社会史研究成就的取得得益于学术理念的更新,而学术理念的更新与多元学术视野有着密切关系。因此,更新观念与跨学科的研究视野仍是我们应努力的目标。只有不断培养新的问题意识,才有可能进行学术创新。

社会史研究的魅力也来自于他以人为本的学术关怀。关注生命,把人的活动放在历史舞台的中央,才能拥有更多的读者,使研究长盛不衰。心态史、医疗社会史、礼俗研究、日常生活、民间信仰与社会风尚的研究之所以受到欢迎,在于他贴近民众。社会史应保持自己学术研究的人文关怀。

还需要进一步开展社会史史料学的研究,深化对史料解读方式的认识,重视资料建设。

对于关心历史的人来说,大历史也是魅力无穷。社会史对于书写大历史应有独特的贡献。从生活切入反映时代变迁不失为一种方法,换言之,日常生活的研究应当展示人类社会的演变,这是社会史与国家史最大的不同。社会史可以使历史丰满起来,具有整体性。从地域史追求历史的整体性,是把握“多元而又高度整合”之传统中国社会的有效方法。

收稿日期: 2006-12-21

作者简介: 常建华(1957-),男,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